

第 8 卷第 3 期 2015 年 5 月

Vol. 8, No. 3, May, 2015

# 国际高等教育

二十周年特色：高等教育未来之路

主编的话 .....	81
本期议题 .....	83
高等教育的下一个二十年：发展中国家的视角 .....	84
大众化和全球知识经济：持续的矛盾 .....	85
高等教育公共使命的危机 .....	86
公平依旧是全球高等教育面临的最重要挑战 .....	87
有效教学所面临的挑战 .....	88
国际大学：高等教育的未来？ .....	89
可持续性和可负担性：灵丹妙药存在吗？ .....	91
从软实力到知识外交 .....	92
保证质量与大众化：能否兼顾？ .....	94
切勿上当 .....	95
维持资源 .....	96
中国高等教育下一个二十年面临的挑战 .....	97
非洲大学毕业生失业之挑战 .....	98
忘记高等教育社会效益的危险 .....	100
大学的误用 .....	101
中国高等教育：未来挑战 .....	102
质量：空前复杂 .....	103
研究型大学面临的非经济挑战 .....	104

“智能国际化”：21 世纪的当务之急.....	105
是否需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	106
非洲的三重难题：扩张、巩固和失业（就业不足） .....	108
大学公信力下降不可逆转吗？ .....	109
排名竞赛十年后仍将继续吗？ .....	110
重新审视学术市场.....	111
全球知识社会：学术思维与实用思维的冲突.....	112
<b>文章</b>	
美国卡耐基高等教育机构分类——比表象有更深的意义，也有更深的问题.....	113
发展中国家的大规模在线课程：希望抑或浮夸？ .....	116
改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工程教育 .....	119
大学有中国模式之说吗？ .....	122
<b>新书速递</b> .....	125

## 主编的话

### 新闻与分析的二十年

就在 20 年前，1995 年的春天，《国际高等教育》(*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杂志首次发行。正如我在第一期中所写，“《国际高等教育》为高等教育所面临的核心问题提供了一个交流信息、辩论及讨论的平台。”我们尤为关注一向被置于国际主流之外的第三世界，我们认为《国际高等教育》将会是一个对高等教育核心问题进行独立分析和评论的论坛。20 年来，我们一共发行了 80 期共 1000 多篇文章，并实现了这些目标。我们提供了从其它渠道难以获得的一些国家信息及相关分析；我们探讨了世界高等教育所面临的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从腐败到新技术的影响、从国际化和全球学生流动的视角到盈利性大学的复杂性问题。同时，我们经常提出一些不同于主流媒体的观点。

在《国际高等教育》发行之初，学术界还没有关注高等教育新闻分析的国际刊物；而现今已经有好几本类似的刊物了，包括国际性的和地区性的。这表明了高等教育的重要性和全球化视野。然而，不同于大多数其他的新闻分析机构，《国际高等教育》立志作为一个完全的非商业团体，踏踏实实致力于提出批判性和分析性观点。

越来越复杂且备受争议的高等教育领域亟需一个具备独立性、充满感召力，有时甚至是有些古怪的声音。随着政府取消对学术机构的资助，更多现存的高等教育相关机构开始变得越来越商业化。由于对入学、教学质量及保持学术内涵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私立盈利性高等教育在世界范围内愈发引人注目。国际化日益以盈利为导向，留学生、海外分校以及其它国际举措都被认为是这些项目资助者的收益。

《国际高等教育》以不同的方式不断成长。从一开始我们就同时发行了该刊物的网络版和纸质版；并且，在高等教育领域，我们是最先使用因特网作为主要出版工具的刊物之一。《国际高等教育》是目前唯一一家多语种的高等教育刊物，包括中文、葡萄牙文、俄文、西班牙文及英文版。本刊物的英文版同时由德国学术界的主要刊物《德国大学报》(*Deutsche Univeritätszeitung*) 全刊转载。多语种版本的发行主要归功于我们的翻译合作伙伴。

《国际高等教育》的纸质版和电子版一直以来都是免费的。此外，我们很乐意其它刊物转载我们的文章，我们也与“大学世界新闻网”(University World News) 保持着长期的再版合作关系。我们已经连续 15 年得到福特基金会(the Ford Foundation) 的发行赞助，现在又得到了卡内基基金会(the Carnegie Corporation of New York) 的赞助。此外，我们还得到来自美国波士顿学院(Boston College) 林奇教育学院(Lynch School of Education) 以及“漠南大学教授项目”(the Monan University Professorship) 的基础支持。

我们已经出版了三本书，书中部分文章最初发表在《国际高等教育》中：

Philip G. Altbach,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Reflections on Policy and Practice* (Chestnut Hill, MA: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2006);

Philip G. Altbach and Daniel C. Levy, eds.,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a Global Revolution* (Rotterdam, Netherlands: Sense Publishers, 2005);

Philip G. Altbach, *The International Imperative in Higher Education* (Rotterdam,

Netherlands: Sense Publishers, 2013).

今天，我们的读者遍布全球 149 个国家，《国际高等教育》的文章经常被全球高等教育领域所引用。《国际高等教育》即将迈入它的第三个十年，我们期待在此基础上继续为全球高等教育的发展及全球性的讨论提供一个重要的窗口。

（主编：Philip G. Altbach）

## 本期议题

二十年前，也就是 1995 年的春天，当《国际高等教育》（*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首次发行时，还未有人听说过“慕课”一词（也即大规模在线课程，MOOCs），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入学率仍低于 10%。当时，私立教育的改革还没有任何迹象；高等教育大众化虽然已经在全球产生影响，但还未被完全理解；全球知识经济也只是处于起步阶段。这些因素以及其它力量的推动，再加上由经济大萧条（the Great Recession）造成的严重经济破坏，都在过去二十年间对高等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那些趋势在二十多年前仅是初现端倪，

而今影响却十分明显，且正塑造着我们所处的环境。学术界有一些关于“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isruption）的讨论，很多学者认为它其实就是“破坏”。我们一共咨询了与《国际高等教育》及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有关系的 25 位专家，请他们思考一个简单但却深入的问题：在接下来的二十年中，高等教育面临最重要的挑战是什么？这一期《国际高等教育》刊登的一系列短文正反映了对该主题最佳全球思考的一部分。

Philip G. Altbach、Laura E. Rumbley

## 高等教育的下一个二十年：发展中国家的视角

Pawan Agarwal

印度技能发展与创业部 (Ministry of Skill Development & Entrepreneurship) 联合秘书、印度政府规划委员会 (Planning Commission) 前 (高等教育) 顾问

电子邮箱: [pagarwal.dsde@gmail.com](mailto:pagarwal.dsde@gmail.com)

过去二十年间, 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经历了一些主要的改变; 而接下来的二十年将会是真正变革的时期。改变主要将在以下四个层面发生: 课堂内、高等教育机构、国家层面以及全球层面的改变。

未来的课堂将基于一种全新的学习模式, 课堂学习的重点将从内容变为方法, 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学习分析将起到关键作用。因此, 未来二十年间, 科学技术对课堂教学的影响将不再微乎其微, 而是意义深远的。教学将针对个体的需求与偏好量身定制, 即便是人数众多的大课堂也会如此。学生将会越来越多地参与实践式和互动式学习, 从自己和彼此身上学习, 从身边的即时环境中学习——学到与在教授那里同样多的知识。

至于教育机构, 其未来的数量将远多于今天。随着各种各样非大学机构的出现, 大学在知识创造和传播方面的垄断力量将被显著削弱。此外, 盈利性大学和非盈利性大学之间的差别也将变得模糊。大学将重心放在教学与科研的同时, 也会分拆出其它的职能。对大多数大学来说, 从学院式向管理式氛围的转变是不可避免的。

不同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大多数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比较成熟且发展完善, 已基本达到高等教育普及化。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 在私营部门的推动下, 过去二十年间高等教育大幅度扩

招。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 发展中国家会将重心放在巩固基础和提高质量之上, 而非进一步扩大教育规模。随着教育成本压力的不断上升, 可能会出现一系列的国家政策将高等教育的成本转移到学生和家長身上。网络平台 and 线上学习将会引领知识的民主化, 并推动高等教育的普及, (到那时) 即便是在最偏远的地区处于劣势的群体也能接受高等教育。虽然高等教育整体质量的差异会大幅减小, 但是顶尖院校间的竞争将会更加激烈, 尤其是在学校声誉方面。

未来高等教育在其规模和范围上的全球性将会远远超越现在, 但也会有所差异。现在, 我们所认为的赢家是那些能够吸引大量留学生到该国主校区就读、或是那些能在国外建立分校的国家。然而, 这并不是一场零和博弈, 所有国家, 甚至是那些向外输送留学生的国家, 都将受益于高质量的教育。

随着全球经济与文化条件的不断深化, 以及数字技术的进一步应用, 全球网络和参与式学习过程将会出现, 其中跨国 (境) 教育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出国完成所有课程的学习是当前的趋势, 但它将会被诸如交换学习等短期出国学习形式所取代。

总的来说, 这些发展将会为高等教育带来积极的结果, 但也不排除一些负面影响。接下来的二十年将是为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未来发展奠定基础的二十年。

## 大众化和全球知识经济：持续的矛盾

Philip G. Altbach

美国波士顿学院 (Boston College) 国际高等教育中心终身教授、主任

电子邮箱: altbach@bc.edu

过去半个世纪高等教育所面临的两大挑战仍将是未来几十年中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提供更多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以及持续发展那些创造和传播当代社会所需知识的研究中心。这两个关键推动力互相对立，代表着学术界两个不同的发展方向。

全球入学人数目前达到了 1.5 亿，在短短几十年间翻了一倍，而且到 2020 年很可能再增加一亿。其中，大部分的增长来自于两个国家——中国和印度。由于日益复杂的经济发展需要更高水平的教育培训，向更多人提供高等教育不仅是必要的，也是促进社会流动及实现人们美好就业前景的关键。

高等教育大众化给政府财政施加了很大压力，但也促进了私立高等教育部门的快速成长。缺乏合格的教师以及较新的学校资源匮乏等问题往往伴随着这种迅速的扩张；这造成了整体教育质量的下降，在一些国家尤为明显。但是，数以百万计的人获得了学历，且总的来说过上了更好的生活。

同时，全球知识经济需要更为完善且最为优质的高等教育来培养那些有能力参与到 21 世纪全球经济中的毕业生。大学要对那些致力于新科学成果的研究给予支持，同时也要作为各学科知识的储藏室。研究型大学作为全球知识经济的引擎，有其自身的复杂性，同时也将是国际网络的焦点。尽管研究

型大学冲力十足，但它们也有脆弱的一面，这些大学需要自主权、共同治理以及学术自由。这些大学运营费用高昂、特性复杂。研究型大学都是需要政府无条件支持的公立教育机构，这一点鲜有例外。同时，这些大学占据大学排行榜的领先地位。但是，政府通常难以了解这些开销巨大却必须存在的大学。

向大量学生提供高等教育的同时又支持精英研究型大学的发展似乎是相互矛盾的。然而，这两者是一个多元化学术体系中必不可少的两部分，并且它们在全球知识经济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个为经济提供越来越复杂的需求，并为成为积极公民提供所需的基本知识，另一个则通过培养最有能力的学生来开展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同时，这两者又都是一个成功的国家经济体所必须的条件。

在未来的几十年间我们需要支持这两个核心目标。但是，在很多国家有迹象表明，支持大众的“需求吸收”为政府带来了过大的负担。此外，快速发展的、通常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私立教育部分，通过提供低质量的教育正好弥补了这一缺口。同时，运营费用高昂的公立研究型大学也面临着惊人的预算削减。一个关键的挑战就是确保高等教育发展的两大方面都能得到适当的支持。

## 高等教育公共使命的危机

Jorge Balán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Columbia University) 高级研究员

电子邮箱: jb3369@columbia.edu

全球高等教育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加强并重振其对公共使命的承诺, 以此回应生均公共资助削减、政府补贴和管理高等教育理念、策略及方法的转变, 并应对学生需求乃至全社会的改变。

公共机构的公有制和资金来源在有些国家通常被错误地等同于公共使命, 在这些国家, 公共机构声望显赫、拥有自治权、在制订公共政策时拥有政治影响力。行政人员、教师及学生通常以高等教育的公共使命为由, 对私人部门的快速发展所带来的不良后果持批评态度, 但是公共机构极少履行它们的公共使命。非公有机构需要国家认可和许可才能运行及享有政府给予的权利和优待, 并从直接或间接的补助中受益。应学生需求而得以扩张的新型以盈利为导向的机构, 在政府的支持下, 确实对保障学生权益、确保教学质量带来了主要的挑战。对各类机构及整个教育体系来说, 重温高等教育公共使命都是恰如其分的。

高等教育公共使命的定义受制于国家和地方政府, 通常演变为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 且在政府的支持减少时变得更加激烈。世界范围内收入和财富不均的现状加剧凸显了高等教育入学的公平和平等问题, 这也是高等教育公共使命的一个重要方面。高等教

育大众化是近来才出现的一个现象, 其原本目的为大大缩小国家内各阶层收入差距, 但失败的案例比比皆是。在很多中等收入国家, 政府不按比例分配稀少资源以支持那些生均成本更高的公立学校, 理由是私立部门在基础研究和高级培训上的能力有限。公共使命的履行需要公共资金的使用更为透明, 从而确保各种好处不会被家境富裕的学生独享, 同时也保证高等教育的所有功能都是服务于整个社会的。

高等教育的公共使命有其普遍的一面, 这一点超越了国别、地区和地方界限, 但它需要得到学校和政府同等的保护和发展。知识生产作为公共使命普遍性的中心, 在全球范围之内进行, 并横跨政治界限, 且随着通信技术革命愈演愈烈。高等教育机构通过基础科学与人文研究, 在全球知识生产中占据关键地位。因此, 高等教育机构决定着驱动和调节知识生产的一系列准则和价值观, 同时也决定着知识生产的公共性及其日益深化的合作性。尽管国际化在高等教育机构中已成为一个流行语, 但高等教育的公共使命, 即保护和促进各个国家知识生产和传播的合作互惠、互相尊重的关系, 需要各院校及政府公共机构更为明确的认可和更为仔细的施行。

## 公平依旧是全球高等教育面临的最重要挑战

Roberta Malee Bassett

世界银行高等教育部高级专家

电子邮箱: rbassett@worldbank.org

在过去二十年的大多数时间里,技术和高等教育的汇集占据了高等教育“未来”的头条。确实,自工业革命以来,大众文化通常将科技等同于未来。但是,在顺应周围世界变迁的同时,教育仍应以人为本,并且支持和促进高等教育的“人道”将一直是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面临的主要挑战。

高等教育的人道是什么?其利益相关者是否包括未来的、在校的和已经毕业的学生,家庭,学术和行政人员,企业雇主以及政策制定者?事实上,高等教育通过科研、技术、师资培训等渠道影响到地球上每个人的生活。但是,直接对高等教育做出贡献和从中受益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社会精英之中。因此,获得高等教育全部利益的平等机会仍然是全球高等教育在可预见的未来所面临的唯一且最为重要的挑战。

鉴于获得大学学位所带来的公共和个人利益都是有据可循的,支持寻求高等教育益处的平等性具有经济和社会意义。个人利益包括更好的健康状况、不断增加的收入潜力、更高的生活满意度和更长的寿命;而公共社会利益则包括较低的失业率、更多的税收收入、更高的市民和义工参与度、更少对社会福利的依赖。此外,将获得高等教育的

机会扩大到弱势群体中意味着将公共福利延伸到那些最需要政府支持性干预的群体中。

尽管世界范围内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都得以增加,但是高等教育入学,尤其是想要就读那些最著名的大学,还是相当困难的。在这些著名大学中,大多数在校生都来自于社会中更加富裕的阶层。尽管很少有国家和机构系统收集有关学生社会经济背景的数据,但是从可获得的国家数据和住户调查数据来看,社会的不公平模式仍然显而易见。例如,在智利,最富裕的五分之一人群的高等教育平均入学率是最贫穷五分之一人群入学率的近四倍之多;而在阿根廷和墨西哥,这一数字分别是五倍和 18 倍。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法语国家中,来自最为富裕的五分之一群体家庭中的小孩占高等教育入学总人数的 80%,而那些来自 40%最为贫困家庭的小孩仅占高等教育学生总数的 2%。

毫无疑问,高等教育入学总人数在全球范围内整体扩张,但是大众化只发生在有特权群体而非各个社会经济阶层中。因此,将高等教育有据可循且重要的利益分配到各个社会阶层,将会是高等教育在下一个十年所面临的最重要挑战。

## 有效教学所面临的挑战

Andrés Bernasconi

智利天主教大学 (the Pontificia Universidad Católica de Chile) 教授

电子邮箱: abernasconi@uc.cl

上千年来, 高等教育通过各社会团体与组织共同促进科研工作, 并传授人们先进知识。久而久之, 高等教育的新功能不断增加, 其定义和紧迫性也多种多样, 比如: 服务教会使命、培训公务员、加强国家认同、推动发展、推进技术革新等。然而, 高等教育机构的核心任务还是教学与科研。

但是, 随着当代大学的革新, 在定义大学的卓越性和优秀性时, 科研的地位已超过了教学。事实上, 在 19 世纪的“洪堡模式”(Humboldtian model) 中, 教学的责任是由科学工作者承担的。而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 科研活动和学习环境的良好互动几乎只体现在博士培养阶段。

此外, 随着学术漂移愈发模糊了科研为本的明确界限, 这使得大学与那些非大学高等教育机构、学院、应用科技学校以及其它应该在职业和技术教育上有影响力和独特取向的机构分离开来, 这些机构脱离其原来的特性, 转而致力于科研使命, 至少它们有着这样的雄心壮志。

由此, 院校声誉和教师个人声誉与科研成果直接挂钩。再加上当今全球排名的影响, 在机构和专业奖励方面, 教学的职能退

居次席。这一现象同样体现在领导层管理重点和教师发展方面。

这种教学附属于研究的现象可能值得推敲。一方面, 世界上绝大多数高等教育机构不开展科研活动。对他们来说, 卓越只体现在教与学上。另一方面, 世界上只有极少数学生能够进入卓越的研究型大学学习, 这些学生在学习和智力发展方面普遍具有较强能力; 然而, 无论教师的教学天赋及其获得硕士学位的努力程度如何, 对于有能力的教师而言, 区别在于: 学生是辍学或勉强毕业还是真正掌握了获得学位所要求的学科专业知识。此外, 从过去 30 年间公共政策普遍缺乏自信的时代精神来看, 政治家们对高等教育机构所能取得的成果失去耐心, 这似乎已达到了历史最低点。不仅是暗淡无光的科研情况令人失望, 高等教育在人力资源开发和生产力提高方面也缺乏效果。

总有一天, 教学也会像科研一样接受同行评审; 除学生评价之外, 专家也会对教室设备、研讨会或实验室操作进行分析和反馈; 对那些善于拓展学生思维的老师授予奖励和认可。

## 国际大学：高等教育的未来？

Hans de Wit

意大利米兰圣心天主教大学 (the Università Cattolica del Sacro Cuore) 高等教育国际化中心主任、荷兰阿姆斯特丹应用科技大学 (Amsterdam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高等教育国际化教授

电子邮箱: J.w.m.de.wit@hva.nl

过去几年里，国际高等教育被一系列名词所淹没，比如：全球公民、国际化和世界一流大学。已有诸多书籍著作、文章和论文对这些名词进行探讨；全球、地区和国家排名也不断借鉴这些名词；全世界各地有关高等教育的使命宣言和政策文件里也可以发现这些名词。但是，这些术语的确切含义仍不甚清晰，它们仅仅是一些看法和解释，而非公认的指标或明确定义的概念。

“国际大学”似乎是该领域新的流行语。最近，也出现在了排名领域中，比如：2015年，《泰晤士高等教育》的排名对全世界最为国际化的100所大学进行了排名。同样，“欧盟多维度全球大学排名计划”(U-Multirank)最近发布了237所大学的国际化定位排名，其目的与《泰晤士高等教育》不同，它没有提到“国际大学”而是谈到了国际定位，但显然也流入了试图鉴别何谓国际大学的趋势之中。

这两者的共同点都是对大学进行排名，且或多或少地运用了一些相同的量化指标。《泰晤士高等教育》的排名将国际学生、国际教师以及国际合作出版物的数量作为指标。这与“欧盟多维度全球大学排名计划”运用的四个指标非常相似，即较强的学术流动、高比例的国际教师和博士研究生数，以及众多与国外学者合作的研究出版物。但这

足以定义什么是“国际大学”吗？另外，只用几个量化指标来衡量的排名方法有意义吗？

如果我们认为国际化是帮助大学提高教育、科研和社会服务质量的过程而非其目的的话，那么怎么去定义国际大学这样一个最终产物呢？如果大学国际化没有标准模型可循，那么我们又怎么去界定一所国际大学的内涵呢？

针对这个趋势，简·奈特 (Jane Knight) 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4年高等教育现状” (The State of Higher Education 2014) 的专栏上发表了一篇《什么是国际大学？》 (what is an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的文章。她认为，对于一所大学来说，国际化真正意味着什么令人困惑。事实上，她认为国际化这一名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实现国际化的方法或模型。她将国际大学分为“三代”：一个拥有多元化国际合作关系、国际学生和教师以及多种国际合作活动的国际化大学；在国外设有分校、研究中心和管理/项目办公室的大学；近来，由多个不同国家的合作机构共同创立或共同发展的独立机构。但是，她的分类里面并没有涉及本土国际化的维度，而各个类型尤其是第一个范畴过于宽泛，对定义

国际大学没有什么帮助，甚至可能会带来相反的效果，即大学可以轻易宣称自己属于其中一个范畴，因而它们是国际化的。在我看来，更好的说法是第一个范畴涉及国际合作型大学，第二个范畴是国际活跃型大学，而第三个范畴则是国际运营型大学。

我所担心的是：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大学在未解释具体含义的情况下，在其使命宣

言和政策中强调他们是国际大学。他们将会利用像《泰晤士高等教育》和“欧盟多维度全球大学排名计划”这一类排名。大学不应该被这样一个一眼看起来有魅力实则含糊的名词所引诱，而是应该专注于其实际教学和科研的质量。但是，正如其它流行词产生的效应一样，恐怕我们很难阻止大学对这些词汇的盲目崇拜。

## 可持续性和可负担性：灵丹妙药存在吗？

Ellen Hazelkorn

爱尔兰高等教育署 (the Higher Education Authority) 政策顾问、都柏林理工学院 (Dubl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高等教育政策研究组主任

电子邮箱: ellen.hazelkorn@dit.ie

世界范围内的高等教育变革相当引人注目，支撑这些发展的是对高等教育需求的显著增长。当《国际高等教育》(*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杂志首次发行时，全世界约有 0.68 亿高等教育在校学生，而如今这一数字是 1.96 亿，且预计到 2030 年将达到 4.3 亿人。同时，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国家中，20~29 岁人群的高等教育入学率平均上涨了 10 个百分点，其中一些国家 (尤其是丹麦、芬兰、希腊和冰岛) 达到了 40% 以上的入学率。随着全球劳动力市场持续飞速调整，人们将在教育上花费更多时间。所有这些都说明了我们会快速前进以成为高参与度社会。高参与度社会意味着绝大多数人将受到高水平的教育，因为这对社会和个人的成就有着重大意义。

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目前我们的社会越来越依赖于受过教育的公民，成为全球经济积极参与者的成本也在上升。尽管一些国家可以增加或至少维持它们的支出，另一些国家却在承受着严重的公共和私人债务压力，以及公众对高税收和扩张公共服务的不满。这导致生均支出跟不上扩张的需求步伐。总的来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2013 年) 提到，高等教育总成本中公共资金所覆盖的比例从 1995 年的 77% 下降到了 2013 年

的 68%。

我这里所提到的内容对读者来说并不陌生。然而，如何在公共支出削减且全球竞争加剧时期提供高质量的高等教育将成为接下来二十年中我们所面临的最重要挑战。

利用全球性排名作为指导必然会加剧不平等。全球高等教育机构数量接近 18 000 所，而前 100 名大学所占比例还不到 0.5%。相应地，这只代表了全世界大约 0.4% 的大学生人数。随着需求的上升，选择性也在加速变化：这是因为总的学生人数在增加，而前 100 名大学所能录取的学生人数相对稳定。因此，顶尖大学每年入学学生数占总学生数的比例都在不断下降。

一些国家试图通过将资源集中投入到少数几个“世界一流大学”中，以提高其质量来平衡需求，并期盼由此产生的益处可以渗透到其他大学之中。少数国家，例如芬兰，采取了“世界一流体系”策略，将优异的成绩所带来的利益平等地分配到全国各地，同时它也是排名表现最为出色的国家之一。

将大多数公民培养成聪明、富有创造力和企业家精神的个体，同时保证国家在世界科学的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两者之间合理的平衡是什么呢？我们已走到大众化高等教育现有模式的尽头了吗？关于一切的成本分担，我们的讨论就只局限于成本分担吗？

## 从软实力到知识外交

Jane Knight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安大略教育研究院兼职教授

电子邮箱: janeknight@utoronto.ca

国际高等教育的政治角色常与软实力这一概念紧密相连。自约瑟夫·耐 (Joseph Nye) 在约十年前提出软实力这个概念后, 软实力就经常被理解为通过吸引力和说服力, 而非高压政治、军事力量或者经济制裁 (这些通常被理解为硬实力) 去影响他国并维护国家利益的能力。

许多学者将软实力看作是当今国际教育合作的一个基本前提。高等教育中软实力的常例包括美国富布莱特莱特项目 (Fulbright Program)、英国文化委员会 (British Council) 的活动、德国学术交流活动 (German Academic Exchange initiatives)、欧盟的伊“拉斯谟斯世界计划” (Erasmus Mundus projects) 等。显然, 这些项目备受推崇且久负盛名, 并为世界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这些项目的核心是促进学生、教师、文化、科学、知识及技术的交流, 但为何我们却称它们为软实力工具呢? 诚然, 这些项目在运行的过程中带有自身利益, 但也涉及到各合作伙伴的共同利益。国际高等教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关于成功者和失败者的博弈; 相反, 它关注的是建立在各机构和国家各自优点基础上的相互交流。重要的是, 对于不同的合作伙伴和国家来说, 所获利益也不尽相同。

在这样一个紧密联系的世界中, 高等教育促进了人才、知识、价值观、创新、经济、技术和文化的跨国 (境) 流动和交换。

但是为什么它会被置于如软实力这样的“权力范式” (power paradigm) 之中呢? 难道自身利益、竞争力、统治力的价值观能够有效解决世界范围内的流行病、恐怖主义、失败国家、挣扎在贫困线的十亿人民以及气候变化这些问题吗? 答案是否定的。原因在于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凭借一己之力解决全球面临的挑战。

权力范式的替代品则是外交框架。外交通常被认为是管理国际关系的手段, 它关注的是协商、调停、合作、妥协以及推进。与权力主导、权威、命令及控制相比, 外交的策略和概念都有所不同。在定义高等教育在国际关系中的角色方面, 知识外交是否比软实力范式更合适呢?

知识是当今紧密联系世界的基石, 是从新的信息与通信技术为特征的网络空间 (cyberspace), 到以大数据为特征的信息空间 (infospace), 再到以知识处理为特征的知识空间 (knowspace) 的不断进化, 为国际高等教育提供了新的机会, 同时也增加了其复杂性。然而, 不可否认的是, 知识会导致一国内部及国家之间力量失衡, 尤其是当高等教育及知识被当做软实力的工具时, 这种情况会更加严重。这在使用外交中的合作与调停等策略作为替代时还需仔细考量。

在知识经济的背景之下, 国际高等教育有机会跳出陈旧的思维框架。同时, 通过辨识利益与效益之间的相互关系, 国际高等教

育能在有效利用知识以解决全球挑战及不平  
等问题上采取积极行动。高等教育是否已做  
好准备，为推动知识外交打头阵，并在自身

利益和统治力的软实力框架内进行改变与创  
新？

## 保证质量与大众化：能否兼顾？

Marcelo Knobel

巴西坎皮纳斯州立大学 (Universidade Estadual de Campinas) 教授

电子邮箱: knobel@ifi.unicamp.br

过去四十年间，高等教育在世界范围内经历了快速扩张。在接下来的二十年中，这种快速增长也许还将继续。到 2030 年，预计将有四亿大学生（2000 年时只有一亿）。而问题在于，能否使得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更加公平，同时保证高等教育的质量能够达到最低的标准？

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高等教育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取决于一国的经济发展、社会环境、历史和政策重点。当许多国家还在努力增加占人口总数多数的年轻一代的高等教育入学率时，有些国家却已经开始面临人口老龄化和（或）政府支持不足等严峻挑战。

以拉丁美洲为例，所有的国家都在努力克服严重的社会不平等问题。提高学生对于高等教育的参与度和学位获得率不仅对于各国未来的发展非常重要，同时，这对于社会流动也非常关键，特别是对于弱势群体——即那些在社会经济领域处于劣势地位的群体、非洲后裔、原住民等。拉丁美洲的学生入学人数持续增长，从 1970 年的 160 万增加到了 2009 年的 2 000 万，毛入学率已经达到 30%，这意味着大学入学率还会继续增长。但是，入学率的增加并不均衡，似乎更偏向于特定阶层的人口。

高等教育的资金来自于政府、学生、家庭以及盈利性企业，资金来源对高等教育的质量有极大的影响。例如，当强调经济回报

时，人们对于高等教育的质量就会非常担心。然而不幸的是，对短期经济效益的追求扰乱了人们的长远规划，导致了高等教育基础设施缺乏、教师资历不足、课程不稳定等有损高等教育质量的情况发生。另外，尽管一些盈利性机构扮演着非常重要的“需求吸收”的角色，但相对于它们提供的服务质量来说，国家主管部门提供给这些机构的自主权太多了。

最后，高等教育大众化将不可避免地带来教学对象多样化的挑战，接受过差别巨大的前期教育的学生比例也显著增加。高等教育机构必须提供专门课程以确保学生不仅能够接受高等教育，还要使每个学生都获得成功，由此减少学生的挂科以及辍学率。而这样的情况是不能以牺牲学生最终获得学位的质量为代价的。

各国应当执行符合以下要求的政策：为那些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处于弱势地位的人们提供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建立并确保高等教育的良好质量并监控教育过程；创设一个鼓励教育机构多样化及创新的框架并建立平等的资助机制。虽然想出一个全面的解决方案非常困难，但每个不同的国家都要在一个复杂的环境中找到资金、入学机会以及质量之间良好的平衡点。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找到一个长期的、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对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稳定都是必不可少的。

## 切勿上当

Daniel C. Levy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Albany) 特聘教授

电子邮箱: dlevy@albany.edu

想要回答高等教育最迫在眉睫的需求是什么这个问题, 我们需要一些稀奇古怪的回答。所以我向喜剧演员格鲁乔·马克思 (Groucho Marx) 请教并改述他的话: “一个四岁的孩子就能回答这个问题。去, 给我找个四岁的孩子来, 我可一点也摸不着头脑。” 我是不是在逃避这个问题, 诋毁它, 或者至少说它无法回答? 但这些都是对这个礼貌的邀请不礼貌的回应。我们大多数人还是对高等教育领域专业人士所给出的答案有兴趣。

在回答高等教育需要解决些什么这个问题时, 我们是应该考虑高等教育的自身利益还是其为社会带来的利益呢? 只有大学校长和政策推动者之类的人才会将二者视为几乎相同的利益。而且, 由于社会经济、政治体系、发展水平、兴趣以及价值观念方面的现实差别巨大, 怎么可能会有答案跨越这些差别, 同时又将高等教育的不同结构与功能解释清楚呢? 然而, 许多同僚会抱着研究型大学的想法来回答这一问题, 我认为对所有高等教育采取单一化的实体和规范化的行动答案并不合适。

高等教育最大的需要, 是去规避或着力

改造那些具有魅惑的理想主义愿景与政策提议。显然, 我们想去抵制那些有潜在隐患的或是缺乏道德的提议; 当它们强加于我们时, 我们会感到崩溃。这些愿景与提议就算有着诱人的价值, 而且值得我们认真考虑, 但其可能取得的收益也是夸大其词的。某些方面是介于巨额成本毫无补贴和补贴不足之间, 还有一些方面介于那些能被预料的和不能被预料的事物之间。从过去和现在入手, 给自己列个清单。而不幸的是, 昔日的问题仍然存在——高等教育增加的资金会对发展有什么影响, 快速及多样化的扩张如何能带来平等并生产效益, 政府资金将如何达成互惠的共同目标。如今, 这些言论与一些宏大图景联系在一起, 例如: 如何创建世界一流大学, 以及质量保证机构、标准、大规模在线课程或与日俱增的市场竞争能够带来何种硕果?

这并不是象牙塔对外界的怒斥。我的答案秉承源自学术界内部 (包括高等教育研究专家) 的大胆设想和提议。对于高等教育需要做什么, 我会更多地去相信无形的手 (我只是部分相信), 而不是来自权威的处方, 更不会相信学术界外的自作聪明者。

## 维持资源

Simon Marginson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教育学院教授

电子邮箱: s.marginson@ioe.ac.uk

高等教育在下一个十年所面临的关键挑战既平凡但又不可忽视, 即维持资源。在这背后隐藏着一个深层次的历史问题, 即高等教育和国家之间的关系。

世界范围内的现代高等教育体系是各政府国家建设策略的产物。各国的学费制度大不相同, 但总体来说, 到目前为止政府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资助了绝大部分的基础建设, 并为优质大学提供了大部分的运营费用。政府以补贴的方式帮助新入学家庭获得教育机会并凭借高等教育增加社会流动的机会。政府在资助科研方面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科研是受制于市场失灵的公共物品。然而, 在许多国家情况有了变化。科研仍主要依赖公共经费, 而且政府希望在此集中资源以最大化提升国家竞争力。但教学可以是公共物品, 也可以是私人物品。

在人均年收入超过平均水平的国家, 高等教育参与率都超过了 50%, 这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高等教育已成为找到全职工作和获得体面社会地位的敲门砖。对于中产阶级家庭 (甚至在有些国家是所有家庭) 来说, 接受高等教育已成为一种趋势, 想要置身于高等教育体系之外十分困难。学费增长常面临很大阻力, 不过人们心中也明白他们不得不让孩子入学, 即使他们必须支付大部分费用。2008 年全球经济衰退时期, 高等教育经费缩减, 即便如此, 也并未引发各界所担心的入学率降低的现象。事实上, 世界范围内

的入学率有了前所未有的强势增长。尽管受到需求弹性影响的事例屡见不鲜, 但总的来说, 许多政府意识到它们可以削减对高等教育的补贴并强制提高学费。这一做法无需付出政治代价, 并且从长远看来, 不至于使入学率降低。这只能意味着“我们还未发现任何情况”, 并且政府经费还会继续大幅削减。高等教育的公共特性将会发生什么改变? 高等教育公共使命因政府在提供资金方面所扮演的角色而得以实现。没有政府强有力的支持, 仅依靠教育机构去维持教育质量和流动是否可行呢?

在参与度较高的高等教育体系中, 问题从“是否能够接受高等教育”转为“接受怎样的高等教育”。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私人消费的主要转变与不断增加的教育供给质量的分化及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息息相关, 同时也与中产阶级家庭的学生集中于顶尖的教育机构相关。有些人或许会说, 我们已经是这样了, 但更重要的一点是, 随着国家退出, 大众公共教育质量崩塌且无法再作为社会流动的跳板。盈利性私立大学学生学业完成率较低, 且它们的文凭在市场上的认可度也较低。在全球大约三分之二的国家里, 经济不公平不断加剧。如果高等教育使社会分层更加严重, 并阻碍社会自主权的话, 那么它将丧失其在公共利益方面的道德基础。它是一个亟需解除的障碍。我们是否正迈向这样的境况呢?

## 中国高等教育下一个二十年面临的挑战

闵维方

中国北京大学 (Peking University) 前常务副校长, 高等教育研究主任、教授

电子邮箱: wfmin@pku.edu.cn

过去二十年里, 高等教育最为引人瞩目的变化之一就是快速增长的入学率。1995 年, 全世界高等教育总入学人数为 7 900 万, 其中中国大约为 520 万。到了 2012 年, 世界总入学人数是 1.96 亿, 这一数值是 1995 年的 2.5 倍; 中国 2012 年入学人数为 3 260 万, 是 1995 年的 6.2 倍。中国是世界上高等教育发展最快的国家。

然而, 国家拨款和质量投入并未和数量增长保持一致, 这导致了较大的班级规模、拥挤的教室和实验室、人均教学设备和书本拥有量的减少, 并降低了教学质量。由于许多大学在低成本学科 (如文学和历史) 而不是在工程技术和科学学科内进行扩招, 这使得毕业生的专业结构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不符。很多大学毕业生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中国教育部意识到了高等教育扩张过快的的问题, 并在 2012 年发文以稳定入学规模。然而, 由于个人和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不断增加, 扩张势头仍然强劲。2013 年, 中国高校总入学人数上升至 3 450 万。预计到 2020 年, 这一数值将达到 4 000 万。目前, 中国高等教育表现为“大而不强”。

因此, 接下来的二十年里, 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平衡数量发展和质量提升, 使中国高等教育做到“又大又

强”。这将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一方面, 中国需要保持一定的增长率以满足大量未满足的需求; 另一方面, 中国还需调整高等教育结构并提升其质量, 从而使得毕业生能在变化着的经济环境中满足人力资源的需求。这需要制定许多政策。首先, 入学人数的增长必须要慢下来, 从而使得大量的毕业生融入社会, 为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

这一问题此前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例如, 在即将到来的 2015 年夏季, 中国将拥有 750 万大学毕业生, 而经济增速已经放缓。因此, 这些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将比以往更为棘手。第二, 增加高等教育质量必须得到重视。这需要更多的质量投入, 包括更多国家拨款、强化教师培训、增加认证以及整体质量管理和评估项目。第三, 通过调整高等教育结构, 高校趋同化应该得到改变, 同时也要依据劳动力市场需求将各高校合理区分为不同层级和种类, 各层级和种类的学校针对的是不同的人力资源需求。第四, 就信息技术而言, 教育机构应广泛分享高质量的教育资源, 如制作优秀教师的在线课程供全国范围内的用户使用。第五, 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 吸收高质量教学项目, 如上海纽约大学 (Shanghai New York University) 的建立。

## 非洲大学毕业生失业之挑战

Goolam Mohamedbhai

非洲大学联合会 (the Association of African Universities) 前秘书长

电子邮箱: g\_t\_mobhai@yahoo.co.uk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是高等教育入学率最低的地区, 其入学率仅为 8%。非洲国家意识到了高等教育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同时为了应对人们对于高等教育前所未有的需求, 即便面临诸多限制和挑战, 这些国家也做出了巨大努力以提高高等教育的入学率。因此, 绝大部分国家的大学入学人数已实现了成倍增长。结果并非出人意料——毕业生人数大大增加了。但是也许没有预料到的是, 几乎在每个非洲国家, 这些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都在不断上升。在某些国家, 大学生失业率甚至达到了警戒水平。高失业率带来的社会和政治问题非常严重, 尤其是由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所引发的问题, 2011 年发生在北非的“阿拉伯之春”就是一个例证。

毕业生失业问题的原因广为人知。第一, 在缺乏充足的资金、物质和人力资源的情况下过分强调高入学率, 致使公立大学牺牲质量以换取数量。这直接影响了所授资格证书的含金量。但是, 除了要求应聘者拥有合格资格证书外, 雇主们更注重毕业生的“软技能”(soft skills)特性和能力——这极少能在大学毕业生身上找到。而且, 大学和社区的联系, 即大学与商业界和工业界、公共团体以及边远地区的联系, 非常糟糕。大学在许多方面都与实际的工作环境断绝了联系。

但不能将所有的原因都归结到高等教育

机构的门阶之下。其他利益相关者也负有同等责任。私营部门作为大学毕业生的主要用人单位, 应当提供短期实习、毕业培训、软技能训练, 甚至是提供经费帮助学生以作为其履行社会责任的一部分。非洲最大的私营企业是外资公司, 它们应当优先考虑聘用当地的大学毕业生。

大部分国家还缺乏多元化的高等教育体系。一个多元化的高等教育体系可以培养出多种多样的人才, 以支撑非洲的发展重点。非洲国家的政府经常因为政治原因将原有的教育机构原封不动变为大学, 或是将理工学院和高等教育学院升级为大学, 这基本上是在创造“更多相同的”教育机构。但是, 劳动力市场对人才的需求更多集中在低技能水平的、通过实践培训的一般文凭持有者, 而不是那些高水平的拥有学术学位的大学生。

非洲目前是世界上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非洲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年轻人口, 对教育的需求非常强烈。非洲经济的持续增长需要高水平的人力资源, 因此非洲必须继续扩大发展其高等教育。但仅靠增加毕业生数量是无法实现发展的。非洲必须确保毕业生能在那些可以发挥自我才能、带来成效的岗位上工作。因此, 非洲需要解决大学毕业生就业难这一主要挑战。在国家层面和大学层面上, 每一个非洲国家都需要一个协调的、明确的策略和行动计划。这样的策略能够帮助我们得到可靠的最新统计数据

(目前极度缺乏这样的数据), 以此创建一个 体系在促使非洲应对发展挑战以及成为全球  
充满活力的高等教育体系, 这样的高等教育 发展中坚力量的过程中极具意义。

## 忘记高等教育社会效益的危险

Christine Musselin

法国巴黎政治学院 (SciencesPo) 科研副校长

电子邮箱: Christine.musselin@sciencespo.fr

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日益增加, 20世纪学生数量的急剧上升证明了该论述的有效性。该论述背后的主要假设之一即是高等教育会拥有巨大的社会效益。一些研究确实表明, 受教育的人群会获得更高的薪资、更好的生活环境、更强健的体魄以及更加开明的思想。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 高等教育所面临的关键挑战将是维持这些社会效益, 并让社会相信教育与培训所做的不只是创造人力资本, 它还有更大的社会功能与目的。知识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其经济价值之上, 它同时也具有社会价值。

近来, 随着发达国家政府为了促进经济增长而强调对更多知识与创新的需求, 一些决策者无视甚至玷污了高等教育的社会贡献。对于参与全球知识经济的国家来说, 如何培养更多有能力掌握、理解并产出知识的高素质工人成为了一项挑战。人们认为, 大学中所学的知识不如毕业后所能找到的工作重要。

我不否认使学生做好就业准备是大学的一项重要使命; 我也不否认高等教育应承担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经济活动的职责。只是在

进行上述这些工作的同时, 大学不能抛弃其他的使命与活动, 不能停止发展纯粹的大学培养项目, 不能终止那些暂无实际应用的“蓝天研究”(“blue sky research”, 即基础研究), 也不能停止发展那些没有直接经济影响的学科。

不幸的是, 蒙昧主义、无知、偏狭和盲从正在蔓延, 正因此, 这项挑战愈发重要。近期在欧洲发生的事件、一些非洲和中东国家骇人听闻的冲突以及乌克兰内战都表明高等教育机构仍然必须提升人文价值、要为公民义务与责任做准备、去承担社会责任。然而, 要想阻止一切劣迹与胡为, 只靠履行这些使命是远远不够的。在某些情况下, 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个人跟没受过教育的人一样极端狂热。尽管如此, 这些教育的使命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有用的。因此, 这些教育使命理应得以保持甚至强化。在高等教育政策首先是要推动经济发展、强化大学的工具性作用时, 做到这些也许会很困难。然而, 只要大学还是一个保护并传播知识与人文价值的地方, 这便是未来几十年中一场需要引领并将取得胜利的战斗。

## 大学的误用

Patti McGill Peterson

美国教育理事会 (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 全球行动总顾问、国际学者交流委员会 (the Council for the International Exchange of Scholars) “富布赖特项目” (the Fulbright Program) 前执行主管

电子邮箱: ppeterson@acenet.edu

我们所生活的时代, 强调的是了解自身的核心使命并忠于这一使命, 这是一个完善组织的根本理念。我对高等教育未来的担忧就在于利益相关者的数量, 利益相关者对高等教育的竞争性需求不断增长, 他们对高等教育核心使命的影响也不断增加。

19世纪50年代, 纽曼 (Cardinal Newman) 在谈及大学时, 他不只想要定义大学对学生的用途, 也要定义大学对社会的功用。纽曼理念的核心在于学生以及教与学的环境。他的理念与社会相联系, 但并不被社会所驱使, 也没有被社会过度改造。

时间快进到100年后, 克拉克·克尔 (Clark Kerr) 认为大学的功用胜过大学这一概念本身。他的“综合性大学” (university) 是一个有着超大用途的机构, 是一个充满竞争观点的地方。根据克尔所言, “综合性大学”针对不同人其意义也不同, 以至于它自身必将处于矛盾对抗之中。

在此列出纽曼和克尔并非只是为了怀旧。这是对大学和高等教育的需求急剧增长的一个讯号。在面对政府、商业领域、工业领域、主要捐赠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认为所需解决的问题时, 高等教育愈发成为解决方案的提供者。

在这种情形下, 忠于一个核心的教育使命并不断在战略上规划以巩固加强这一使命, 这是相当困难的。高校就像作战在俄国

前线的拿破仑, 战线过宽, 补给线却太短。

使所提供的教育与劳动力需求相吻合, 解决毕业生的就业问题——这不再只是那些高职院校的任务, 而今所有高等教育机构都越来越多地担负了这一责任。这导致了本科阶段的高等教育稳步“职业化”。

根据即时效用设计高等教育课程的危险是真实存在的。针对工作市场的需求设立大学学位、为专门的工作培训学生, 这都可能会导致经常性失业。全球化的力量和新发现可能会导致一些企业倒闭、取代整个行业并轻易淘汰掉那些知识不全面且无法与时代接轨的毕业生。

然而, 我们无需回顾“大学校” (Studium Generale) 的概念以认清高等教育的核心使命, 但是是时候考虑怎样平衡大学的相关性和全时性、平衡短期功用和长期能力了。在展望未来之时, 我们需要在思考“有用”意味着什么的同时, 也要考虑到高等教育对其学生和社会的义务。如果其核心使命是对学生进行终身教育, 那么, 高等教育的功用就应包含: 培养个人有意义的生活所需的智力、为公民提供接收良好教育所需的资金, 以及培养个人在多种工作与职业间转换的能力。

杰出的大学和发达的高等教育体系将在法律范围内回应社会需求。在保持大学精髓的同时应对这些需求可谓是一个挑战。

## 中国高等教育：未来挑战

Gerard A. Postiglione

中国香港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教育学院首席教授、副院长

电子邮箱: gerry.hku@gmail.com

2020 年的关键问题是：借助独特且可出口的大学模式，中国会成为国际高等教育中的一股主要力量，还是微小力量？目前，有几本书的题目已经表明了这是个值得一问的问题：《中国何时统治世界》(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后美国世界与他国崛起》(The Post-American World and the Rise of the Rest)；《中国会统领 21 世纪吗？》(Will China dominate the 21st Century?)。

随着中国距离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咫尺之遥，有迹象表明经济增速放缓，也有人担忧高等教育会因此受到何种影响。中国已是高等教育在校学生数最多的国家，而且在学术论文发表和科研与发展经费上仅次于美国。几所一流大学进入了世界级大学排名，尽管总的来说其高等教育体系在质量指标上的表现还不尽如人意。在一个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发起的、60 个国家参与的评估中，中国最大城市中学生在学习与自然科学上的成绩是最好的，这预示着中国高等教育美好的未来。

虽然在中国，如何创建一个独特的大学体制以迎合“北京共识” (the Beijing Consensus) 的争论仍在继续，但全球大学排名竞争阻碍了以本土理念构建大学的努力。与此同时，大学在与毫无启发性的课堂教学作斗争，媒体就曾报道过学生们在课堂上睡觉的事例。近期的调查发现，许多老师以批判政府和共产党来活跃课堂气氛，这使得人

们倡议多开设马克思主义课程。中国领导人也明白，中国大学不只是创造与传播知识的工具，它们也是参与国际竞争的有力武器。中国已实行了一系列举措以提升科学、技术、工程以及数学领域的软技能，从而推动产业创新和中国经济的全球化。尽管如此，失业毕业生数量的激增还是阻碍着中国向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过渡。

中国大学在 2025 年的全球影响力将取决于如何处理好国内需求和国际化愿景间不稳固的平衡。国内需求包括雇主为了升级产品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城市里中产阶级家庭为了孩子能够表现优秀所需的地位文化；农村的贫穷者、移居者和少数民族所需的平等的机会与工作。相较于对于祖国繁荣、兴旺发达、稳定统一的需求，这些需求仍是次要的。中国精心构建了大学国际化的愿景，要求大学的国际化不能牺牲教育主权——即便国家最终还是要给予大学更多自主权。

到 2020 年，中国接受大学教育公民的数量将会超过美国劳动力的总数。虽然目前中国赴美留学人数是世界之首，但中国正成为海外求学最受欢迎的目的地之一。正如哈佛大学 (Harvard University) 教授傅高义 (Vogel) 所说，中国对高等教育改革开放的广度与深度都堪比西方文艺复兴的“智力活力” (intellectual vitality)。然而，到 2020 年的时候，中国能在何种程度上拥有独特且可出口的大学模式以推动国际高等教育，这仍是一个关键问题。

## 质量：空前复杂

Liz Reisberg

Reisberg 教育咨询公司主席

电子邮箱：reisberg@gmail.com

优质教育曾经非常简单，即细心挑选合格的学生，给他们提供某个学术领域内的课程内容，然后颁发一个能准确反映其合格知识与成绩的文凭。现在，不断变化的现实模糊了教育质量的意義和衡量标准。

几乎所有地区的毛入学率都有所上升。虽然这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是一件好事，但扩招必然意味着入学学生之间的背景巨大差别。多数情况下，大学都会面临因学生间知识与技能的巨大差异而阻碍学术成功的问题。高校必须分配部分资源用于补救教学——但是这种承诺非常有限，因为在超过 12 年的时间内累积下来的不足是很难弥补的；另一方法是降低成绩标准；再或者是接受较高的学生流失率。每种方案都可能对高校教育质量有所影响。

高等教育的财务压力日渐增大。公立大学学费低廉，有时甚至免费，但可容纳的学生数量有限。这就使得以“需求吸收”（demand-absorbing）为主导的私立机构迅速扩张，并随之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营利性附属机构。私立大学依靠学生及其家庭缴纳的学费运转。这类大学需要招满学生以偿付成本或是（常常）获取利润，从而为了达到财务目标而向学生质量和教学质量妥协。

鉴于国际质量已成为如何看待和比较高校的一个因素，许多大学开始走捷径，花钱请第三方机构来加强自己的国际化程度，快速取得重要的学术成果。更大力度的招收国

际学生也已成为一项重要的收入来源。允许第三方机构在高校管理中扮演重要角色，这已给不合格及不道德的行为敞开了大门。

高等教育的目标已变得更加令人困惑。人们愈发期望大学教育能够成为将来就业的保障，他们也认为如果一个大学毕业生未被雇佣，那么这个大学所提供的教育就是低质量的。

大学正被迫开展更多科学研究以提升在国际排名中的位次，与此同时，教授们不得不通过清晰定义“学习结果”以显示其对学生的影响力。与教师压力的增加相伴而行的则是教师终生制或永久性职位的减少、兼职教授数量的增加，以及有限的基础设施。

因此，问题依然存在，什么是大学的质量？人们期望高校招收多元化的学生群体，确保他们能达到相应的水平，而与此同时，大学获得的资金预算越来越少，教师要发表国际索引的论文、确保学习结果及所有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应该是这样吗？通常，对不同的人来说，质量的意義各不相同。如今，高等教育周遭复杂的情况要求我们建立一个更为牢固的质量测量方案，并以大学的使命为基础。但是，如果大学正在产出“质量”，那么我们就这样定义：政客、雇主和父母家长应该减少批判，承担一些财政责任，并在其他方面为必要的举措提供支持，以满足其期望。

## 研究型大学面临的非经济挑战

Henry Rosovsky

美国哈佛大学 (Harvard University) 荣誉教授、文学和科学学院前任院长

电子邮箱: henry\_rosovsky@harvard.edu

这是一个针对研究型大学的问题——研究型大学强调科研、本科和研究生教学，同时也强调人文、科学和专业学院。如果没有这类大学，高等教育将难以为继。

最重要的，研究型大学的整体质量取决于两个紧密联系的因素：学术自由和共同治理，这是最近我提出的建议。大学如何选择其领导者、教师及学生？政府是否在特定奖学金或学术言论上施加限制？谁决定着课程与研究方向？在中国，在教学和研究中过多受到西方影响可能会受到质疑；在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中，原教旨主义宗教 (fundamentalist religion) 禁止女性投身于社会发展之中；在美国，立法机关，有时也包括那些捐赠者，可能会试图跨越体系内部和学术领域的权利边界。我所知的顶尖研究型大学都享有学术自由或是特定形式的共同治理。

必须明确的是，我并不认为参与共同治理的人员都应该在大学里工作；但学界内部的意见需要得以重视。另一点应该说明的是，学术自由，即教师和学生在学习、学习和知识追求不会受到不合理的干预；这与政治自由不同，尽管两者实际上几乎一样。一直存在的挑战显而易见。

20年的时间并不长，并且没人认为学术氛围会受制于突如其来的变化。而由此又引出了另一个可预见的挑战：专业主义和/或渐增的反智主义。在美国或其他地方，我认

为“为了学而学是一项无聊的活动”这一观点，是一种奢侈，且不应该得到支持。在学生看来，教育的目的就是工作和事业，这也是设定课程大纲的依据：会计学可以让学生找到一份好工作；计算机科学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莎士比亚等文学类课程只是学生有时间可以学学的选择。而国家则认为“人力资源满足劳动力需求”是很重要的。基础科学需要得以支持，因为生物学研究可能会带来某些疾病的治疗方法，特别是当投资者身患此种疾病时。虽然这些论点有其真实的地方，但是为什么这些论点也表明了社会学可能没有用，人文学科则不值得被支持呢？

当然，我对高等教育所面临的常规挑战更为了解：技术引起的破坏、高昂的运营费用、大规模的开放式在线课程使课堂学习不再具有价值等等。我并非怀疑它们的重要性，但我想多说一下“超脱利害的学习”

(disinterested learning)，对本科生而言，我们则称它为自由（通识）教育，因为人们少有提及这类学习。然而，基础知识的进步通常始于“不计利害”的研究者为了解决某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令人入迷且未有人涉足。在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中，出现的问题极少得到明确的解决，一代又一代的学生和教师们需要重新去解读那些被研究领域所提出的宽泛的问题。这些努力就是研究型大学的知识精髓。

## “智能国际化”：21 世纪的当务之急

Laura E. Rumbley

美国波士顿学院 (Boston College) 国际高等教育中心副主任

电子邮箱: rumbley@bc.edu

接下来的 20 年中, 世界高等教育面临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智能国际化”(intelligent internationalization) 的关键需求。

国际化作为对全球化的回应, 是提升教育质量和可见性的一种策略, 或者说对于教育大环境中发展的同质回应, 国际化可能是最有影响力的现象之一, 它影响着全球的高等教育机构。国际化或许既可以被看作是全球知识经济到来的原因, 也可以被认为是其产生的影响。在不同的国家和院校环境中, 在我们所认为的是什么构成了当今具有重大意义、高质量的高等教育这一问题上, 国际化是其基本的或是正在形成的改变的体现。

“流动”仍是大多数国际化讨论的核心; 同时, 世界范围内渐增的学生流动数量表明, 在可预见的未来, “流动”仍然意义重大。然而, 在许多国家中, 无论是政策还是实践, 国际化议程中至关重要的方面现正由边缘走向中心。在长期的、地位不断提升的有关“本土国际化”的讨论中, 在大学日益重视发展、维持国际伙伴关系的广度和深度之中、在渐增的为教职员工提供更多以国际和跨文化为导向的培训与支持之中, 我们都能清楚的看到国际化的重要性。

同时, 这些发展正在高等教育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和不断变化中展开。政治、经济和

社会发展正向高等教育施加着巨大的压力, 促使高等教育(在其他事物中)“表现”、“回应”、“创新”、“培育”、“评估”及“引领”。国际化议程深陷于上述过程之中。想要处理这样的复杂情况需要致力于“智能国际化”。它立足于知识体系之中, 该体系连贯地囊括了那些针对提升我们理解地区国际化和全球国际化复杂现实的理论与实践。这需要我们致力于培训该领域有思想的实践者, 与研究者、决策者以及高校领导人通力合作, 因为在谈及支配着现今国际化的许多战略性讨论的“大问题”时, 他们对存在于其中的实践性相当敏感。

世界范围内有着致力于高等教育专业人才教育和培训的研究中心与学术项目。其中, 许多研究中心和项目似乎都关注着国际化相关事宜。但是, 正如它们的研究项目的质量以及它们所提供的培训一样, 这些研究和培训工作的范围并不清晰。同样地, 对于决策者与实践者的信息和专业知识的需求, 以及研究者和教育培训者实际教授的内容, 这两者间的联系并不清晰。

“智能国际化”需要科研、实践者与政策社群精心构建的合作发展。那些参与策划国际化活动和议程的人可以获得相应的信息、想法及专业的技能培养机会, 这些将会增强他们的能力以掌控未来 20 年中复杂而又多变的高等教育环境。

## 是否需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Jamil Salmi

全球高等教育专家

电子邮箱: jsalmi@tertiaryeducation.org

随着上海交通大学在 2003 年首次发布其国际大学学术排名，以及紧接着出现的全球大学排行榜（《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台湾高等教育评估和认证委员会[Higher Education Evaluation and Accreditation Council of Taiwan]及 QS 大学排名等），更多确立世界一流大学系统性的方法应运而生。因此，各国政府最关心的是找到最为有效的方法来促进国内顶尖大学取得巨大进步。少数国家，例如，哈萨克斯坦和沙特阿拉伯，则倾向于重新建造新的大学；而大多数国家则采取合并和升级现有大学的策略。

为了加快改革步伐，一些政府已发起了所谓的“卓越计划”（excellence initiatives），并为这些计划注入了大量附加资金以助力其高等教育领域的发展。近来实施的卓越计划主要在东亚及欧洲地区展开。这些计划着重提升科研，而有机会获得这些资助机会的大学为数不多。

卓越计划中多数项目都标志着参与国资助政策思维方式的重要转变。例如，在法国、德国和西班牙，政府一贯认为所有公立大学的表现相当，而卓越计划则显示了从统一预算补贴向竞争性拨款的转变。

衡量卓越计划的有效性绝非易事，其中至少有两个原因。首先，对大学进行升级需要花费好几年的时间。由于许多卓越计划都是近期开展的，因而想要衡量这些计划的成

效时机可能不够成熟。第二个原因则在于属性问题。尽管基于大量院校样本之上，其相关性可能会得以辨明，但建立因果关系的因子则需要个案研究的深入分析。

同时，我们可以发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持续竞赛所面临的危机和挑战。过度强调科研向外界发送了错误的讯号，让人认为教学质量并不重要。国际排名明显偏爱研究型大学，这是以牺牲优秀的本科教学型院校为代价的。例如，在美国，诸如威尔斯利学院（Wellesley College）、卡尔顿学院（Carleton Colleges）、威廉姆斯学院（Williams College）、波莫纳学院（Pomona Colleges）等文理学院和欧林学院（Olin College）等工程学院都被认为是杰出的学院。

对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视可能会进一步强化精英主义。在追求学术卓越的过程中，顶尖大学的选拔极为严格，很有可能将那些来自下层群体的学生拒之门外，这就是风险所在。入读印度理工学院（the Indian Institutes of Technology）的成功率为百分之一，这使其成为世界上录取条件最为苛刻的大学。同样的，常青藤盟校是美国入学条件最为严格的学校。

在非民主国家，对学术自由的限制会阻碍发展学术卓越。对于自然科学来说，这些限制可能并无大碍，但是它们却阻碍了社会科学家对那些具有政治敏感性的问题进行科学调查，比如说在中国、俄罗斯和沙特阿拉

伯等国。

考虑所有情况之后，政府应该将其注意力放在发展健全的高等教育体系之上，而非

只关注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完善的教育体系应囊括所有的高等院校，从而满足各类学生群体不同的学习需求。

## 非洲的三重难题：扩张、巩固和失业（就业不足）

Damtew Teferra

南非夸祖鲁纳塔尔大学（the University of Kwazulu-Natal）非洲高等教育国际网络主任、教授

电子邮箱：teferra@ukzn.ac.za

非洲高等教育在上个世纪已取得了骄人的发展。当前，预计有1400万学生就读于该地区中的埃及、尼日利亚、南非和埃塞俄比亚等国的高等教育机构。该地区有着500多所公立大学和1500多所私立大学。然而，该地区的入学率仅仅约为6%，处于世界最低水平。

如果增加的入学机会可以视为非洲高等教育成功的标志，那么，其教育质量的残酷现实则削弱了以上论点。非洲高等教育入学人数的激增，随之而来的却是教学和科研质量的急剧下滑。高等教育的大规模扩张意味着课堂规模的膨胀、教师的超负荷工作、资源缩减、活动减少以及设施的毁坏，这为高等教育质量危机带来了一场暴风骤雨。

高等教育大规模扩招所带来的影响在科研领域的表现最为明显。非洲在科研生产力的数据总是低迷地徘徊在1%。尽管非洲高等教育系统的发展神速，但该地区在其科研生产力上并未有任何体现——这是在知识时代一个痛苦的事实。低下的教育质量与知识生产力一直是非洲高等教育的特点，因而该教育体系需要在扩张的同时巩固其学术上的卓越性。想要改善这一局面需要对科研和发展持续投入努力以及有价值的资源。

由于快速的扩张和不稳定的巩固，一度勉强容忍的毕业生失业难题随之浮出水面，且来势凶猛。非洲到处是未就业和未充分就业的毕业生，在某些情况下这引起了有组织的抗议活动。由于非洲的入学率仍以个位数

计算，它仍需赶上世界其他国家的步伐，大规模的毕业生未就业已经成为严重的国家、地区和国际难题，随之而来的是由未就业毕业生所点燃的“阿拉伯之春”（the Arab Spring）。

尽管相关政策或项目的实施日益被狭隘的政治幻想所压制，高等教育扩张仍然是国家发展计划的一部分。因此，开设新的公立院校受到了政治命令而非相关性与适合度的影响。开设新的大学已成为该地区政权纲领的一部分，受到了当权者和反对派的热捧，他们期待这一举措可以为其选举投票加分。如此愚蠢的政治行为也许会损害非洲高等教育体系潜在的多元化，它将更多压力施加于扩张与巩固、数量与卓越间脆弱的关系之上。“一国内所有公立院校均为平等”的平等主义观点不仅有缺陷，同时也代价巨大。

非洲高等教育的三重难题复杂而又令人生畏，没有立即生效的解决方案。因此，发展多元化的高等教育体系、扩大传递模式、多元化融资、重振质量体系、健全院校自治以及发展“强健”的课程体系，都有助于解决非洲高等教育的混乱困境。

非洲日益增长的自信心和其国际形象，缘于其持续的宏观经济发展、富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逐步消退的内部斗争、更为可靠和透明的政府机构。更重要的是，合理的高等教育观念可以使非洲高等教育发展的前景更为乐观。

## 大学公信力下降不可逆转吗？

Ulrich Teichler

德国卡塞尔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Kassel) 荣誉教授

电子邮箱: teichler@incher.uni-kassel.de

当代社会走向一系列特定的环境，这常被称为“知识社会”，我们希望大学可以在该趋势中成为赢家。一些专家发出了如下警告：大学将会失去他们对于知识生产和知识利用的垄断与寡占地位，而仅保留的是授予学位的权力。同时，即便是这种权力也并非肯定的，因为人们对大学评估有效性的信任受到了挑战。

近年来，学界中的评估方式激增，如指标、评价、评论、排名、评级及测试等。这些评估的可信度正在下降，因为大学屈服于低质量评估带来的压力，而非合力应对这种压力。

例如，不负责的排名发布者大都成功掌控了有关世界一流大学的不稳定指标。并且，他们顺势强化了这样的观点，即高等教育与科研的未来是依赖其精英分子的，而大众高等教育只能是糟粕。

同样地，大学屈服于这样的理念，即学者应努力在同行评议的期刊中发表论文，从而显现出其学术影响力。再者，他们也大致认可那些飘忽不定的顶级期刊清单可以被操控这一事实。因此，他们更加认为：学界内部关于质量的看法很重要，而在知识社会中的相关性可以被忽略。

在结构本质上有另外的问题：在有关学生评测方面，即授予学位，大学值得信任

吗？实际上，课程学习变得更灵活了。一些学生在入学前就已获得了相关能力，并获得了前阶段学习的学分。在课程学习期间从一所学校转入另一所学校是在德国深受青睐的传统，这一做法在其他国家也受到了追捧。实习，即在学校之外的环境中进行学习、获得经验，通常也成为了必需。在其他大学学习个别课程的机会也在增加，如通过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 (MOOCs) 这样的方式。在海外学习一段时间也受到人们的青睐。总之，在学位授予院校进行学习的时间减少。因此，单科性大学可能会失掉其公信力，在正确评估学生从不同学习场所取得的技能这一方面，它们的能力可能会受到质疑。所以，我们或许需要独立于大学之外、负责学生咨询和评估的机构。

高等教育机构在步入知识社会的进程中面临着地位的下降，不仅是因为它们在整个知识生产与传播中所占的份额减小，也是因为人们对学者与教育机构自身在正确评估研究和教学方面的信任减少。如果大学与专业学者不能尽快扭转局面，那么大量的评估、排名及指标实际上可能会日益受到外界的控制。而且，如果变化的教学环境并未造就新的指导和评估方法，那么学术力量的最后筹码，即学位授予，可能也将不复存在。

## 排名竞赛十年后仍将继续吗？

米泽彰纯

日本名古屋大学 (Nagoya University) 国际发展研究院副教授

电子邮箱: yonezawa@gsid.nagoya-u.ac.jp

大约在 15 年前，国际大学排名仍处于萌芽阶段，只有少数专家认为世界大学排名将会对大学、政府及公众有着广泛且重要的影响。如今，在寻求大学伙伴关系及合作时，排名情况被看作是必要的信息。即使一国的大学并未进入排行榜前列，但政府在颁发国家奖学金或是招纳新员工时也还是常常提及排名位次。排名竞赛十年后仍将继续吗？答案是肯定的，但其形式可能会大有不同。

大学和个人追求世界一流的学习与研究环境这一持续现象还将继续。因此，想努力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数量将进一步增加。例如，在 2014 年，日本政府启动了一个为期 10 年的资助项目以支持“全球顶尖大学” (Top Global Universities)，该项目旨在使本国 10 所大学进入世界百强。

同时，由于因特网的引入，大学周围的环境产生了巨大的改变。现在，几乎所有最新产出的知识都能在全球即时共享。语言障碍依然存在，但翻译自动化几乎已处于实用阶段。即便是作为知识创新核心部分的分析与写作，都正向自动化转变。视听材料和云端学习工具正在融入日常的教学、学习及研究中。研究人员的具体活动一般通过以下途径得以监测：他/她发表了什么，发表的是哪一类型的文章，引用了什么，具体工作的影响等。这些信息通常汇报给作者及大学管理者。

排名方法也在频繁改变，部分原因是有关大学活动相关信息的快速增多，同样也是由于有着多种背景的“排名参与者”显著增加。因而排名的结果也各不相同。例如，2014 年，《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 的“世界大学排名”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的“全球最好大学排名” (Best Global Universities) 中，仅有两所日本大学进入前 100 强，而在上海交通大学发布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 (Rankings of World Universities) 和“QS 世界大学排名” (QS World-Class University Rankings) 中则分别有三所和五所日本大学进入前 100 强。那么，这些排名到底意味着什么？国际大学排名结果因其指标选取和权重的差异而各不相同。“欧盟多维全球大学排名” (U-Multirank) 并未给出全面的综合排名，而是允许其使用者选择指标和权重，现在其他的一些排名也是如此。排名提供者发布基于专门主题的专业排名或其他排名的现象也变得相当普遍了。

大学排名提供者的黄金时代似乎已经退去。排名的使用者，包括大学和政府，现已在搜寻适合其目的的排名上有了更多选择。如果排名致力于更好地了解大学纷繁复杂的背景，那当然是很好的。然而，各利益相关者应该做出努力，避免将多元化的大学一概而论，或是将其置于一个统一标准之下。

## 重新审视学术市场

Maria Yudkevich

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 (National Research University-Higher School of Economics) 副院长

电子邮箱: 2yudkevich@gmail.com

几十年来,我们对大学的印象总是与象牙塔的比喻有关。这一比喻深埋于脑海之中,我们从未质疑。然而,大学不再是象牙也不再是塔了。事实上,大学的身份及其界线变得愈发模糊与虚幻。原因如下所述。

首先,新的教学和学习技术挑战了大学在获得基础知识和应用知识上的垄断地位。利用主要在线教育平台进行课程学习的学生数量大幅上升;同时,许多大学中的教职员工不得不考虑调整其课程以吸引学生。尽管顶尖大学在提供教学服务方面明显有其优势,但大量中等水平的院校必须知道如何竞争,从而吸引未来学生的注意力——既要与其他大学竞争,也要与在线教育提供者竞争。如果汇集不同大学的课程所需的交易成本较低,那么那些最为优秀且要求很高的学生仍将只就读于一所大学吗?还是他们会在不同的学校就读以获得丰富的学习体验呢?

其次,传统上,受聘于终身教职的青年教师一般都能获得终身教职。而今这样的机会大幅减少。在许多国家,终身职位所占教师职位的比例越来越少,因而教师获得第一个稳定职位的年龄都在上升。

实际上,大学在发展基础研究上的垄断地位受到了来自非大学研究机构 and 企业的挑战。这些机构与大学争抢最为优秀的学者,为他们在薪酬及研究机会上提供富有竞争力的条件,有时则是包括长期的聘用。

最后,在科研生产力绩效标准以及寻求外部资助机会的压力与日俱增。这种压力可能会对学术卓越准则造成负面影响,这将发现新知识作为从事学术活动的内在动力,同时这种压力也迫使大学将教师视为带有明确绩效指标的雇员而非一群学者。

高等教育大众化增加了大学的数量,同时也增加了大学的多样性。来自不同质量阶梯的大学在 20 年后还能识别出处于同一类别中的其他学校吗?处于顶端的研究型大学与其他学术层级的大学间会有更多共同点吗?我们还将拥有“曾经的大学组织”中的罕见例外——传统的研究型大学吗?

由于大学是几个世纪以来最为稳定的机构之一,我们也许会认为它们将一直存在下去。然而,问题在于:大学的界线是什么?如何定义大学的组织身份?那些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才是否愿意到那儿工作呢?

## 全球知识社会：学术思维与实用思维的冲突

Pavel Zgaga

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Ljubljana) 教育政策研究中心教授

电子邮箱: pavel.zgaga@guest.arnes.si

在人们创造出知识经济这一概念后的几十年中，它就不再只是一个社会科学概念了。这一概念在政治、媒体及日常用语中随处可见。它获得了全新的意义与解释，同时也有对立的观念出现，这就自然而然地引发了大量的问题。例如，它为知识的传统形式（如学术知识）带来了什么影响？

学术知识几百年来备受推崇，然而现在人们对此有了新的声音，人们常常会这么说：“这只是学术知识”。定语“只是”体现了某种勉强的感觉。它暗示人们除了“传统的”学术知识，还有其他知识的存在，即高价值的“现代”知识。这类知识被提升到了“有用的”、“有效的”以及“多产的”地位之上，它是“无用的”、“抽象的”和“理论上的”，即“只是学术”知识的反义词。世界上的学者们，特别是那些在人文社科领域工作的学者日益被置于这样一个境地：他们需要去证明其受到质疑的“传统”研究的“意义”、“相关性”及“有效性”。所以，为了知识本身而存在的知识是变成了知识社会的濒危物种吗？

知识社会崇尚“有用的知识”，其特点是较高的可信度。今天，这类知识推动着经济的发展。在知识社会，风险落到了管理者肩上，而可信度和确定性则是自于“知识工作者”。他们产出的有用知识是基于局限于

必然事物的专门研究工作。这类知识产生于世界上各个大学校园，同时也来自于校园之外：“有用知识”的产生日益扩展到非大学机构及商业企业之中。

在大学发展的漫长历史中，大学一直是乐于接纳且鼓励其他科研工作的一片天地，因而科研工作不能只限于必然事物。大学把自己提升为智力对峙（intellectual confrontation）的舞台——我们周围还有许多未知的领域，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我们还有无数不了解的情况。科研对峙（research confrontation）即是与不确定性以及未知事物的交锋。这正是真正吸引一位研究者的东西。不幸的是，这类研究所带来的知识在今天很容易被视作“无用之物”。

如果我们使用不同的词汇，那么学术知识和实用知识并非是知识大类中互相排斥的两种形式。它们只是知识的两种形式，是几种认识论中的两类而已。大学现在面临的挑战之一就是对于知识社会这一概念的不合理解释，这导致了“有用的”与“只是学术的”知识间的冲突与等级关系。从高等教育视角来看，我们有必要重新构建知识社会的理论及其概念，包括对其标准维度与意识形态维度的批判。该问题对高等教育的目的及高等教育机构的使命有着重要影响。

## 美国卡耐基高等教育机构分类——比表象有更深的意义，也有更深的问题

Philip G. Altbach

美国波士顿学院 (Boston College) 国际高等教育中心终身教授、主任

电子邮箱: altbach@bc.edu

美国鲁米娜教育基金会 (the Lumina Foundation) 与印第安纳大学 (Indiana University) 高等教育研究中心, 将会从卡耐基教学促进基金会 (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 那里接管重要的卡耐基高等教育机构分类工作。鲁米娜基金会表示其学历资质概述 (Degree Qualifications Profile) 将会指导 2015 年的高校分类。然而这一发展又一次偏离了卡耐基分类的本意, 即给出一个客观易懂的美国高校分类。

近年来, 卡耐基基金会的分类愈加复杂: 一方面是为了迎合基金会当时的特定政策方向, 一方面则是为了反映高等教育机构增加的复杂化。因而, 作为理解高等教育体系和 4 500 多所高校的一个简单且还算准确客观的方式, 卡耐基分类变得不那么有用了。卡耐基分类原本最大的优势之一是它的简洁与客观性, 它将高校分为易于辨认的不同类别, 而不是将其进行排名。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和其他的排名系统不同的是, 卡耐基分类不采用声誉评价法, 即让高校的学者和管理者为处于竞争中的高校排名。

卡耐基分类的新赞助者将如何改变其方向仍然无从得知, 不过其新主管表示 2015 年版的分类不会有根本性改变。鲁米娜基金会一贯强调入学机会、平等和学生毕业率以

及设计一个新的国家学历评价框架——这是一个相当值得称赞的目标; 然而, 考虑到这些, 从长远来看, 卡耐基分类很有可能会发生变化, 从而与鲁米娜基金会的政策议程相协调, 这就正如在卡耐基基金会后期的几年中发生的很多微妙的变化一样。

原来的卡耐基分类曾做出过巨大贡献: 明确高校的职责, 让美国以及国外的决策者和个人能整体上基本了解美国高等教育的全貌并知道每一所高校在其中的归类。卡耐基分类在国际上也非常有用, 它给出了通往美国许多种类学术机构的路线图。一个有意向与美国的研究性大学、社区大学或者戏剧学院合作的海外高校, 能够轻而易举地找到一个适合的合作伙伴。而现在, 我们可能会失去这一宝贵的资源。

### 历史回顾

追溯至 1973 年, 那时距离声名赫赫的克拉克·克尔 (Clark Kerr) 创立“加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 (the California Master Plan) 已过去了 10 年。他当时正领导着卡耐基高等教育委员会 (Carnegie Commission on Higher Education), 试图了解美国的多样化及当时迅速扩张的高等教育格局。最初的卡耐基分类大致符合了克尔关于多元化高等教育体系的构想, 即不同类型的高校服务于不同的目的、需求和地区。它当时只包含五个主要的

的分类及几个子分类：可授予博士学位的综合性大学和学院、文理学院、两年制学院与机构、职业学院，以及其他特殊教育机构等。

作为高等教育体系的第一次分类尝试，卡耐基分类的影响力很快扩散开来——政策制定者重视这样一个基于客观数据的高校分类，而高校学术领导人也发现分类对于理解其高校的归属相当有用。卡耐基分类胜在简洁，人们信任分类的赞助者，认为其客观中立。尽管分类只是将高校按照字母顺序列入不同类别，并不是一个排名系统，但还是有很多人以竞争的眼光看待卡耐基分类。一些大学很想加入“研究型大学—I”这一类别，因为该小分类中的大学有着最多的科研经费、颁发最多的博士学位。所以，当一些大学的学院被列入这一分类的时候，它们感到欣喜若狂。类似地，那些录取条件最为严格的文理学院都在“文理学院—I”分类里，所以，也会有很多学院想加入进去。慢慢地，卡耐基分类变成了一种非正式的测量方法——即便不是用于排名，至少也是用于评价学术地位。

## 调整与变化

经历了美国高等教育几十年来的几次重大变革，卡耐基分类的类别与分类方法仍相当稳定。2005年，卡耐基基金会的领导层发生了变动，因此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基金会的领导者们称，美国高等教育的现实要求重新考虑分类方法。基金会的关注点也可能发生了改变，基金会希望修改卡耐基分类以适应其新方向并支持其政策焦点。基金会修改了基础分类，加入了诸如教学项目、招生信息等新的类目。分类变得更复杂了，慢慢地也变得不那么具有影响力了。人们发现新

加入的类目混淆了分类的根本目标，并且新加入了似乎并不完全相关的变量。这损害了卡耐基分类根本的简洁性。事实上，现在人们仍然会引用“卡耐基研究型—I”（顶级研究型大学）这样的分类，即使该分类已经有20多年没有出现在卡耐基词库中了。

卡耐基分类将来很可能还会有更多调整——美国联邦政府期望将高校按花费和学生毕业率分类，这也许将为分类增加一个新的维度。一个更深层的困境是营利性高等教育机构的角色问题，这些院校在方向和管理上都与传统的非营利性高校有着根本的差别，与此类似的还有新兴的提供线上教育并颁发学位的机构。这些高等教育格局的新加入者该不该列入分类之中？这些因素都将造成“分类潜变”这一糟糕的想法。

## 另一转折点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卡耐基分类有可能会发生史上最大的改变。倘若新赞助者最近的声明意指卡耐基分类的未来，那么卡耐基分类将可能被改造得面目全非，并从本质上摧毁克拉克·克尔原本的想法——建立一个简洁且客观分析的美国高校分类系统。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卡耐基分类为了迎合其赞助者（卡耐基教学促进基金会）的政策目的而改变。鲁米娜基金会作为新的赞助者，也毫无疑问地将会改造卡耐基分类，使之适应其需要、推动其议程，改造的结果很可能与卡耐基分类的最初目标无关。

## 什么才是真实需求

令人惊讶的是，在克拉克·克尔提出卡耐基分类概念之后的40年里，并未有人站出来为全美超过4500所的高校提供一个清晰且有一定客观性和综合性的导向。恢复克

尔最初卡耐基分类的基础目标与组织结构并不是什么复杂事，也并不需要高昂的花费。

诚然，高等教育业已变得越来越复杂。那么，应该如何应对营利性机构的问题呢？可能的解决办法就是为其新增一个专有门类。许多社区大学现在都提供四年制本科学位，但其基础目标和组织结构并没有什么本质变化。现在大量的专业学校、许多学院和大学都已扩张并多元化其学位或其他可提供之物。科技已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些高校教学计划中的一部分，同时，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MOOC）的革命还在持续展开。科研生产力急剧增长，研究成果的发布方式更为多元化。各种类型的知识产权对学术机构来说都已越发重要——至少对研究型大学即是如此。

然而，最初分类的基本元素，即有助于确立高等教育机构主要目标与功能的基本元素，虽然有些更难描述了，但其关键指标仍然没变。关键指标足够清晰：

- 在校学生数
- 授予学位数
- 颁发学位种类
- 教师总数（全职与兼职）

- 科研与知识产权收入
- 科研生产力
- 国际化水平（以学生流动衡量）

还有几个可以添加进来——但是还是要强调的是，“简洁”是这项工作的口号。

将高校分为六个主要类别、八个主要子分类，这似乎是正确的。这些类别还可以扩大以适应不断复杂化和多元化的高等教育体系。

容纳该系统复杂性和多样性的增加。卡耐基分类后阶段的反复改变增多了分类的类别，但却令人感到困惑，这些改变部分反映的是基金会政策及其哲学取向。保持高校分类方法尽可能的简单直接，才能最好的服务于分类的根本目标。

这些指标用以评价每个高校显然不够细致与完整，它们还需要进一步的定义。尽管如此，它们还是会为建立合理的分类体系提供基础信息。这些指标缺少近年来已蔓延到卡耐基分类的哲学与政策取向，这些哲学与政策取向让分类工作回归其原初目的，即描述美国高等教育格局中的丰富性、多样性与复杂性。

## 发展中国家的规模在线课程：希望抑或浮夸？

Ben Wildavsky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Albany) 纳尔逊洛克菲勒政府  
研究所高等教育研究主管

电子邮箱: ben.wildavsky@suny.edu

最早的大规模在线课程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 简称 MOOC) 是由加拿大马尼托巴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Manitoba) 于 2008 年开设的。然而, 大家议论纷纷的 MOOC 革命直到几年后才真正开始: 营利性教育机构 Udacity、Coursera, 以及美国哈佛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联合推出的非营利性在线课程 EdX, 是其横空出世的“三驾马车”。三者今天仍然是 MOOC 界最知名的三大平台, 其典型特色是提供以短视频片段、小测验、在线讨论与同行打分的书面作业为形式的免费无学分课程。

从一开始, MOOC 的全球化潜质, 特别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 是其让人着迷的关键所在。斯坦福大学 (Stanford University) 两位著名的计算机科学家曾将其人工智能导论课程放到网上, 免费提供给世界各地的学生。他们迅速吸引了来自 190 个国家的 16 万名学生。当时光注册这门课程的立陶宛学生数量就远远超过了斯坦福大学的总学生数。

从那时起, 其他的一些 MOOC 也开始大规模的发展开来。最大的 MOOC 提供商 Coursera, 拥有一千万名注册学生, 他们接受 100 多所大学的在线授课。它的商业模式还未被验证, 但其极具吸引力的前景使其获得了 8 500 万美元的风险投资。随着业务增长, 其野心也越来越大。Coursera 宣称要在未来实现一个愿景: 现在只有为数甚少的学

生能够享受的世界一流教育, 将来要让每个人都能享受到。

### 持怀疑态度者

然而, 倘若伴随着 MOOC 的出现, 人们对其在贫穷国家中能让更多人享有高质量教育的潜力产生了巨大的热情, 那么用不了多久, MOOC 的浮夸就会被公众的厌恶所取代, 或者说至少公众会持巨大的怀疑态度。批评者们认为, MOOC 的鼓吹者们极大地夸大了谁将会从免费、大规模的在线课程中真正受益。而且, 他们还认为 MOOC 对非西方文化的调整不力, 甚至会是新殖民主义的工具。

MOOC 真的会让发展中国家受益匪浅, 亦或只是夸张的过分吹嘘? 批评者为其理由列举了很多证据。其一, 大多数 MOOC 学生都已经拥有学历且生活在发达国家中。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曾调查过其 Coursera 课程的超过 40 万名活跃用户, 发现其中三分之二都来自美国和其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的成员国。这 34 个工业化国家的人口仅占全世界人口不到 18% 的比例。

而且, MOOC 似乎没有覆盖到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上述的调查发现, 宾夕法尼亚大学 Coursera 课程的学生中, 83% 的人

都已经拥有两年或四年的学历（另外还发现发展中国家的学生中，三分之二都是男性）。

除此之外，MOOC的高退学率可谓是臭名昭著。在2012和2013年，17门EdX课程的学生中，只有5%拿到了结业证书。

最后，诋毁者坚称，MOOC鼓吹者所承诺的教育民主化之所以实现不足，是因为它本身就建立在有所缺陷的假设上，它错误地以为世界上的其他人都将从MOOC营销中受益。批评者将MOOC称作西方学术统治的精英主义工具，MOOC没有针对非西方文化进行合适的调整，带有破坏当地高校与学术传统的危险。

## 利大于弊

曾在2012年到达巅峰的MOOC狂热现已消退，取而代之的则是大量的怀疑观点，这一点不足为奇。批评者所给出的一些警告的确值得认真审视。然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MOOC确实利大于弊，特别在他们把MOOC看作科技实现教学法（technology-enabled pedagogy）中的一种发展形式而非静态教学方式的情况下。

MOOC神话终结者的说法没错：来自低收入国家、教育程度低的非西方人仅占MOOC学生中极少的一部分，而且MOOC的学业完成率很低。然而，这些结果本身就很有误导性。MOOC学生数量非常庞大，以至于即使有90%的学业未完成率，仍然会有一万多个学生获结业证书，这一结果相当引人注目。此外，许多被计算为“退学”的学生，可能本来就是想尝试一下课程而从没想过完成学业。

学生的教育背景也并非如数据表面所显示的那样普遍享有特权。报道称，在2012年

和2013年的EdX课程注册学生中，有三分之二学生拥有高等教育经历，但这仍然表明有22.3万名学生拥有高中及高中以下的教育经历。

此外，在MOOC第一批入学的学生中，较富有且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占多数，这一点不足为奇；毕竟，在逐渐改变社会大众之前，个人电脑和互联网革命是由精英人群开始的。

那么，人们所说的MOOC学术内容、所属高校和教学方法中的西方新殖民主义又是什么呢？也许，对这种夹杂意识形态的批评的首要回应就是，没有人是被逼着注册MOOC的。西方大学对于那些有途径、有动力、且想要进行面对面学习的发展中国家学生有着巨大吸引力；同样的，例如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这样的大学所提供的在线课程也具有相当的吸引力。

## 进展中的工作

对于MOOC是否能在不同文化环境中实现有效教学的疑问其实很合理。而思考发展中国家MOOC问题最有效的方式，是将其看作进展中的工作。简言之，我们处于大规模工程下的一段实验期。

在美国，一些MOOC课程可以提供短期的、注重实际应用的证书，而非提供那些完整学位的课程。还有一些MOOC课程可能会最终吸引到那些主要目的为“浏览”的学习者，他们与图书馆读者类似。对于参与程度更高的学生，混合式的课程模式正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此种课程模式充分利用高质量的课程内容，同时又根据学生自身的优缺点给予学生面对面的个性化教学。

例如，在非洲，93%的大学适龄人口并

没有上大学，多种类型的 MOOC 及类似 MOOC 的企业正通过混合式的课程为学生提供教育服务。而寻找最合适的技术是一项挑战。宽带互联网连接通常很难获得，这使得手机成为传送课程的最佳方式。发展专家费弗曼（Guy Pfefferman）指出，在非洲，2001 年有 2 500 万人拥有手机，这一数字在 2013 年跃升至 2.8 亿。现在，在例如加纳、喀麦隆、尼日利亚和坦桑尼亚这样的国家，80% 或者更多的人已经有了自己的手机。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EdX 已经宣布与 Facebook 合作建立一项名为 SocialEDU 的项目。这项试点项目将从卢旺达开始，将超越今天 MOOC 的技术，建立一个利用现有且价格低廉的移动设备为平台。学习内容由 EdX 免费提供。Facebook 则将负责应用程序

部分，并创建一种移动学习环境，而这正是许多人认为的将免费、高质量课程大规模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的关键。

尽管怀疑与否定并未停歇，但日益扩增的教育愿望、大幅提升的技术手段以及更具创新性的教学方法的组合必然将 MOOC 带向更加全球化的舞台。MOOC 肯定需要进一步发展，以更好地服务于学生。然而，判断高等教育新形式的标准，不应是其是否完美，而应当是与许多学生面对的其他不够完美的学习选择相比，特别是在世界上最为贫困的国家，新的教育形式是否更好。

注：本文改编自《国际教育者》(*International Educator*) 2014 年 5 月/6 月刊登的文章

## 改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工程教育

Goolam Mohamedbhai

非洲大学联盟 (the Association of African Universities) 前秘书长

电子邮件: g\_t\_mobhai@yahoo.co.uk

撒哈拉以南非洲是世界上高等教育入学率最低的地区, 仅为 8%。由于意识到高等教育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 且为迎合不断增长的高等教育需求, 非洲国家在面临诸多约束和挑战的情况下还是付出巨大的努力以提高高等教育入学水平。大多数国家的入学人数翻了几番, 其结果就是近几年内实现了强劲的经济增长, 并吸引了大量海外投资。然而, 海外投资项目却因为国内缺乏高技能劳动力而受到阻碍, 这使得引入外国技术成为必需。对非洲来说, 要想维持空前的经济增长、在国际舞台上富有竞争力, 那么人力资本的发展是首要的, 特别是在工程技术领域。

非洲对工程能力的迫切需求有以下几个原因: 为了实现其发展轨迹中的基础设施发展; 为了加速其工业发展, 特别是在制造业领域, 从而使其成为一个制成品出口国而非进口国; 为了催生非洲对能源前所未有的需求, 从而克服其时常受到的能源严重不足的情况; 为了获得开采丰富自然资源的控制权; 为了实现“千年发展目标”(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 工程教育的现状

最近, 几份关于非洲国家提供工程教育和培训的报告相继出版。2012 年, 皇家工程院 (Roy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 出版了一份鉴别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工程能力需求的

综合报告, 该报告是基于对 113 位专业工程师、29 位决策者和 18 个非洲国家的电子调查, 以及对来自非洲不同国家的 15 位工程项目领导者进行的访谈。2005 年, 非洲技术政策研究网 (African Technology Policy Studies Network) 出版了一份关于尼日利亚、加纳和津巴布韦工程教育能力的报告, 数据来自对各利益相关者的调查问卷和采访。另外, 在 2010 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出版了就工程学而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报告, 该报告由全球 120 位专家的意见组成, 特别强调了工程在国际发展中的重要角色。

这些研究揭示了两个关键的发现。首先, 非洲工程能力严重缺失, 它必须依赖引进外国专家。这或许是由以下原因所造成的: 培训机构输出不足无法满足国家需求; 大学毕业生质量较差, 缺乏实践经验和技能, 致使他们无法受雇; 本地的外国工程公司更愿意引入自己本国的技术工人; 大学毕业生不愿意在乡村地区从事低薪工作。

第二, 工程技师的严重缺乏。通常, 为保证工程行业的有效运行, 专业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的比例应为 1:5 或 1:6, 这就意味着对技术人员的需求远大于工程师。然而, 在非洲, 这个比例更多是 1:1 或 1:1.5, 这表明许多有资格的工程师被大材小用而从事技术人员的工作。大多数国家正将科技专科学校和职业技术学院升级为提供学位的综合性大

学, 且没有意图替换这些专科学校, 在这种情况下, 以上的这些比例可能变得更加糟糕。毫无疑问, 非洲需要更多优秀的专业工程师, 但同时也需要大量经过实践训练的、全能型的技术人员, 他们不仅能支持工程师的工作, 同时也能服务并创办中小企业, 从而创造就业机会、改善生活质量并全面利用当地资源。

## 改善工程教育

这些报告指出了要改善工程教育和培训的一些措施。首先, 现有院校迫切需要更新其基础设施和实验设备。获得公共资助的非洲高等教育机构几十年来遭受着缺乏投资的困扰, 这已经导致了基础设施状况的恶化。

工程科学的课程设置也需要重新修订。现行的课程设置大多数是从欧洲或美国的大学照搬而来, 没有经过更新, 未必适合非洲的状况。

教学方法也有待完善。由于学生人数众多, 各科目通常都是以权威式的教学模式进行授课, 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与老师之间都很少有机会互相交流讨论。人们认为在工程教育中, 问题导向型学习方法 (Problem-Based Learning approach) 可以显著地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并帮助他们获取一些“软技能”, 如有效沟通、团队精神、创造力和适应力以及其它满足毕业之后就业所需的能力。

与改善教学方法紧密相关的是针对工程学师资的教学培训需求。大多数的讲师虽然可能获得了该领域的博士学位, 但并不擅长运用合适的教学方法帮助学生。很多非洲的大学目前坚持要求所有讲师必须获得博士学位, 这未必是正确的做法, 或者不一定行得通。对很多人来说, 在某个恰当的领域

获得硕士学位、取得一些业界经历、再经过一些教学培训, 将更好地帮助他们完成教学。尽管一些院校已经开始尝试引进教学培训, 但针对非洲大学科研人员的教学培训还不太普遍。

最后, 所有的研究都强调产学结合的重要性。大学和产业界的联系可以呈现出不同的形式: 使产业界参与并指导课程改革; 邀请产业界代表服务于工程学院委员会或高级行政机关; 引进商业界和产业界专家作为兼职教授。产业界最重要的角色应该是为学生提供两个阶段的实习培训: 在课程期间, 以企业实习的形式, 让学生处在工作的环境中, 从而促进他们未来的就业; 在课程结束时, 帮助学生达到必要的专业认证资格。非常可惜的是, 几所非洲大学由于学生数量不断增加带来的难题, 已经停止了企业在学生课程期间的参与活动, 这导致学生不得不在毕业后自行负责接受相关就业培训。

## 工业发展的潜力

非洲正站在发展道路的十字路口。人们普遍认为, 非洲的年轻一代及其丰富的自然资源, 是需要被充分开发的两大重要方面。教育和培训, 尤其是在工程技术方面, 则是非洲大陆释放其潜能的必要途径。

工程教育大概是最需要关注的一个领域, 因为它能为工业发展提供高技术人员。然而它却面临着许多挑战, 因而迫切需要非洲政府、工程教育机构、产业界代表以及私人部门共同解决。

需要与改善工程教育培训质量齐头并进的是, 非洲国家需要创造一个动态的工业环境。只有这样, 工程才能够茁壮成长并充分发挥潜力。一些掌握工业和制造业重大投资或参与非洲主要基础设施发展的非洲以外国

家，通过为非洲工程学生提供专业培训、雇佣当地工程毕业生等形式给非洲带来了巨大的帮助；总而言之，赋予非洲工程师更多权力并影响技术转移，这对非洲经济和工业发展至关重要。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工业发展只有在集聚了一定数量的技术人才的时候才能发生，而技术人员的培训又依赖于工业的吸收能力。关于这一点，进行对非洲工程能力和需求的国家评估

可能会有所裨益。

注：本文取自世界银行的报告“改善撒哈拉以南非洲工程教育的质量”（*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in Sub-Saharan Africa*），由 Goolam Mohamedbhai 撰写，完整版刊登在《非洲高等教育国际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Higher Education*）上。

## 大学有中国模式之说吗？

查强，史静寰，王晓阳

查强：加拿大多伦多约克大学（York University），教育学院副教授

电子邮件：qzha@edu.yorku.ca

史静寰：中国北京清华大学（Tsinghua University），教育学院教授、执行院长

电子邮件：shijhuan@mail.tsinghua.edu.cn

王晓阳：中国北京清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主任

电子邮件：wangxy@tsinghua.edu.cn

在过去的十五年间，中国高等教育的飞速扩张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98～2010年，入学率以每年17%的速度增长。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在精英学校计划中投资巨大，以期将一些学校和项目提升到世界一流水平。这一举动引发了全世界努力建造世界级大学的竞争。中国目前在高等教育扩张上的成功引起了一些探讨和争论，主题是关于大学是否存在新兴的中国模式。这篇短文对这一主题的一些深入调查进行了概述。

### 辨别中国模式的两大方法

两大方法正在成为探索中国模式的基础：历史文化法和社会政治法。前者将议题嵌入儒家知识传统。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知识传统体现了历久弥坚的思考模式或文化自觉的突出特点，这必将作用于既定社会发展形态的建构之中。所以，中国大学确实有着儒家学术传统。尽管大学被植入中国的土壤仅大约一个世纪，但作为学习型组织，人们很自然地将它与统治中国教育长达两千多年的儒学民族精神联系起来。沿袭传统路线，自由教育的概念目前是根治中国大学衰落的一剂良药。自由教育与儒家知识传统相联系，强调人本教育的重要性，这意味着向

历史学习，而非借鉴西方模式。为了和西方概念相区别，这种实践有一个中文名字——通识教育。历史上，中国曾经经历比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更深刻的人文主义教育。因此，过去十年见证了中国大学日益鼓励实行自由教育并整编和扩展课程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很多中国大学的自由教育组织把自己称为“书院”（唐宋时期盛行的进行古典学习的私立学校），并有意将自己与儒家传统联系起来。

历史文化法主要利用“理想类型”（the ideal type）的概念。理想类型通常是通过基本的概念和定义分析历史独特架构的有用工具。然而，也有人认为当代中国大学用100多年的时间尝试了各种西方和苏联模式并吸收了它们的影响，所以很难获得从儒家传统的特色和元素中塑造出来理想类型。然而，即便得以恢复，书院也已在当今中国社会中失去了它的文化氛围。所以，研究表明当前环境中的通识教育只能带来表面的影响，是建立在与政治目的相关的功利主义方法上的，是为了创造“世界一流”大学或进行特定目的的品牌营销，这一点不足为奇。就其本身而言，通识教育已经变成了一个形式大于实质的问题，它无法给学生带来学习体验

的重大转变。

而当代社会政治法则认为中国的社会政治发展模式（或“北京共识”）构建了中国大学所运行的规范环境，明示了国家的核心角色，强调了效率对加快经济增长的意义。这个模型绝对可以在中国大学中得到阐述，它在资源的有效流动和短时间内极大扩张及提升基础设施建设的能力方面发挥了优势。因此，从推动入学率的快速增长、建立新的管理结构，同时力图打造世界一流大学的角度看来，中国体系非常引人注目。中国大学的这些鲜明特征都反映出了强有力的国家计划与冲劲。在扩张的高峰年份，中国高等教育财政拨款在1998~2006年间的年均增速为17.4%。2012年，中国前50所研究型大学名义上研究收入平均约为两亿美元，远超过2000年清华大学七千万美元的当年最高收入。所以，中国大学目前授予了全世界理工科将近四分之一（24%）的学位，这对知识经济来说意义重大。在2001~2011年间，中国在理工类同行评议的期刊文章中所占比例从3%上升到了11%，增长了将近四倍，这使得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理工科文章产出国（仅次于美国），并且在排名前1%的文章中，中国所占比例在这期间翻了六番。这些数字表明，中国在高等教育的发展中大步前进，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这都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

当代社会政治法采用开放系统理论。开放系统理论学家认为高等教育本质上是一个居于“超系统”（suprasystem）内的系统，这个超系统是由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所组成的。这个开放的系统拥有着各个环境之间的互动，通过这些互动大学开始接受特定的价值观、适应该环境中重要的结构和过程。然而，“北京共识”背后基于实践的推论则

强调和追求切实的利益，这造成了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在中国社会和学术界的盛行。此外，整体的按部就班主义（最好的阐述是“摸着石头过河”）可能阻碍了监管环境制度化的重要努力。因此，似乎存在这样一种悖论：一方面，近年来中国大学在决定其内部事务时被赋予了更多的权利（以它们的表现和责任作为交换）；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在它认为需要的时候可能会随时加大对这些大学的控制。

## 两种方法在方法论上的局限

尽管历史文化法有很多优点，但也有缺陷，即缺乏一个连接传统和现代元素的中国模式完整情境化过程，虽然这个方法确实是受情境约束的。更确切地说，它在当前中国文化传统断裂的转型社会中遭遇挫折。历史文化学家如是说，中国大学当前所处的环境与传统大有不同，而且一个纯粹的传统环境几乎不可能重建。这样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将会影响巩固历史文化言论的传统决定论的有效性。

当代社会政治法的优点是将中国模式的论述放到当今现实生活条件下，这一做法会提供一个有用的方法将众多社会、政治和经济要素纳入分析中去。更明确地说，它准确地将中国经验定义为前所未有的，是中国环境下独一无二的经验。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国经验就很难证明中国模式的存在了，因为一种模式需要启发并推动其他国家的进步。

## 结语

上述两种方法都强调了中国例外论，不管是反映传统文化环境还是当今社会政治模式。这又造成了学者对此现象的调查驻足不前，转向诸如此类的两分法：儒家传统 vs.

现代价值论；中国特色 vs. 世界文化。我们相信，树立儒家传统，站在现代价值观的对立面，可能会忽略传统历久弥坚的模式以及文化交流的鲜明特色。事实上，当代儒家言论本身就是组成全球化意识形态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中国的大学运行和国家政治目标之间的紧密结合同样可以与西方大学合法化的一个主要理念联系起来：高等教育的政治理念——证明大学的合法性缘于其对政治体的深远意义。因此我们建议，可以将这一探讨放到更广大的全球环境中去，并由此开启一扇门，去观察和发现 19 世纪以来甚至更早开始的中国元素和西方高等教育体制之间的互动（演进）。从那里出发，我们才有理由提出一种潜在的中国大学模式。这种模

式源自儒家传统元素以及西方模式的创造性的有机嫁接，同时来自于不同的文化环境。换种说法，大学新兴的中国模式毫无疑问是中国环境特有的，但是与其他体制或模式具有相似特征，这种方法或许阐明了这样一个概念：正是这种不同特征（儒家和西方模式）间的结合铸就了中国模式的独一无二。不过，中国模式究竟是全球模式的一个变体还是替代物，这仍然是个问题。

注：这篇文章是由劳特里奇（Routledge）出版社出版的《高等教育社会学手册》（*Handbook of the Sociology of Higher Education*）中一个章节的删减版。

## 新书速递

Araya, Daniel, and Peter Marber, eds.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Global Age: Policy, Practice in Emerging Societies*.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351 pp. (hb). ISBN: 978-0-415-871768-4. Web site: [www.routledge.com](http://www.routledge.com).

该书聚焦于新兴经济体——即诸如海湾国家在内的、尽管富足但其学术体系仍处于发展阶段的国家。该书中的 17 篇文章围绕以下话题展开：东亚新兴的高等教育、欧洲博洛尼亚倡议的全球影响、俄罗斯和欧亚大陆的区域网络、墨西哥的盈利性大学、排名的作用等。

Fisher, Donald, Kjell Rubenson, Theresa Shanahan, and Claude Trottier, eds. *The Development of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Systems in Canada: A Comparison Between British Columbia, Ontario, and Quebec, 1980–2010*.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14. 450 pp. Can\$39.95. (pb). ISBN 978-0-7735-4308-9. Web site: [www.mqup.ca](http://www.mqup.ca).

加拿大高等教育体系以其省份为基础。该书比较了加拿大最大的三个省份（不列颠哥伦比亚、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的高等教育体系并对其差异进行了分析。由于同一国中的三个省份在高等教育方面有着不同的取向，因此对比分析得到的结果很有意思。该书对于分析其他以联邦制为基础的国家尤其意义。

Geiger, Roger L.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Learning and Culture from the Founding to World War II*.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584 pp. \$35 (hb). ISBN 978-0-691149394. Web site: [www.press.princeton.edu](http://www.press.princeton.edu).

Roger L. Geiger 无疑是当今记述美国高等教育历史最为著名的学者。这一全面的著作涵盖了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高等教育发展的方方面面。该书延伸了高等教育的历史记事，从殖民地学院的出现，到 19 世纪后期大学所经历的发展，并一直延伸到 20 世纪大众教育的兴起。

Higgins, John. *Academic Freedom in a Democratic South Africa: Essays and Interviews on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Humanities*.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14. 272 pp. (pb). ISBN 978-1-61148-598-1. Web site: [www.rowman.com](http://www.rowman.com).

书中文章涉及的主题是方方面面的。其中，部分章节是关于南非的学术自由，另一些是有关人文学科以及对三位著名学者的采访。

Jiang, You Guo. *Liberal Arts Education in a Changing Society: A New Perspective on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Leiden, Netherlands: Brill, 2014. 301 pp. \$149 (hb). ISBN 978-90-04-28230-8.

由于教育者试图提升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广阔视野以使学生们更好地适应全球知识经

济, 因此人文学科和通识教育在中国正稳步发展。该书记录了中国通识教育的历史及发展, 并用个案研究说明了此种教育形式的发展方式。

Kelly, Andrew P., and Sara Goldrick-Rab, eds. *Reinventing Financial Aid: Charting a New Course to College Affordability*. Cambridge, MA: Harvard Education Press, 2014. 278 pp. \$29.95 (pb). ISBN: 978-1-61250-714-9. Web site: [www.harvardeducationpress.org](http://www.harvardeducationpress.org).

经济援助、学生贷款以及其他相关的财政问题是美国高等教育论战的核心。这些问题涉及到接受高等教育更广泛的主题, 特别是对经济状况不佳的学生而言。该书聚焦于

美国复杂的财政援助体系、借款偿还及学校对学生的援助问题等相关主题。

Kennedy, Michael. D. *Globalizing Knowledge: Intellectuals, Universities, and Publics in Transformat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406 pp. (pb). ISBN 978-0-8047-9343-8. Web site: [www.sup.org](http://www.sup.org).

该书内容丰富, 关注知识、社会运动、大学及社会力量的交叉领域。关于一系列近期社会运动的个案调查, 如在许多国家发生的“占领”运动, 都被用来说明以上主题间的关系。另外, 该书也讨论了知识的全球传播与应用。